

#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27 期 2014 年 9 月 15 日

##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朱正·2

揭开当代秦始皇的面纱·佚名·12

1957：鸣放小报《真理塔》·朱泽航·15

绝处逢生·萧至刚·19

忆旧·刘一痕·25

纪念赵文滔兄·朱正·29

啊，夹边沟·高野·30

夹边沟古拉格遗骸冢墓志铭·高野·34

前四川省主席王缙绪将军生平·王复加·35

归来者背后：政治犯出狱记·袁凌·44

消逝的五座劳教营·袁凌·50

八十年一梦·白桦·59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126.com](mailto:bsyy1957@126.com)

# 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朱正

## 反右派斗争的远因

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不是偶然的。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同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夕，提出了一个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言而喻，这是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这一方针的核心和重点，是“改造”这一项。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在全国知识界开始了历时近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正义感和独立精神，使之产生一种原罪感和负罪感，感到自己的出身、教养、经历、社会关系和世界观……无一不是有罪的。在运动的进行中，普遍采用侮辱人格的手段。史学家顾颉刚1952年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受：李琦同志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之感。（7月30日）学委会派来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8月8日）

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觉，就好像狱囚遇到了狱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样。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一些胆战心惊的知识分子只好努力去做一个伪君子，以保平安。这也正是思想改造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对知识分子更沉重的一击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场被称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紧接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场文字狱开展的，遍及全国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大学师生、中小学教职员、工商企业、文化团体……都在紧张进行。列入“肃反对象”的多达一百四十万人，占当时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四分之一以上。从胡乔木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可以知道，在这数以百万计的肃反对象中，查出了“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另外还查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人。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1949年以前在旧军政机关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官职的人。而在占肃反对象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那一百三十多万人，不但没有现行问题，就是在履历表上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记录的。把他们列为肃反对象来审查，来斗争，只能说是斗错了，肃错了。不用说，这被错斗错肃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当然是满腔的委屈和怨恨。

肃反运动是1956年基本结束的。正好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示出一种广开言路的姿态。于是，这一百多万被错斗错肃的人中间，就有许多人趁此机会诉说冤苦了。这表现为当年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大矛盾。

概括地说，经过从思想改造运动到肃反运动这些不间断的大小政治运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打击。因而就形成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呢？在知识分子这一方，希望

对于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无端伤害，给他一个说法，还他一个公道。他们对于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按照自己最大的好意去理解，以为肃反之类的政治运动，正是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集中表现，以为自己蒙冤受屈的问题可以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殊不知这并不符合毛泽东整风的本意，毛最终是用反右派斗争来解决这一矛盾，把诉说冤苦定性为倡狂进攻。由此可知，反右派斗争是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的猛烈爆发。中国的民主党派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也同共产党保持着距离。当国共两大党的斗争激化起来，在“二者择一”的条件之下，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投身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殊死斗争中，大敌当前，也很需要民主党派的合作，至少在影响敌占区人心向背这一点上他们能起的作用甚大。在这个时候，对他们即使有所不满，也是采取一种忍让克制的态度。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可见是十分注意不要得罪这些同路人，而在心里却早已打定了胜利之后跟他们分手的主意了。苏联解体之后，从公开的秘密档案中可以看到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史达林的电报，其中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史达林没有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复电中表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大约是几年之后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方针的最早渊源。中国的那些热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因为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主张，才组织民主党派，才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才因此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当国民党的统治即将被推翻的时候，他们曾经幻想可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1948年10月，罗隆基以民盟留沪中委的名义，“写了一个向中共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1.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2.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3.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4.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国民党被赶出了大陆，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这些民主党派的矛盾就尖锐了起来。其实，共产党早就预计到了这一点并且决定了对策。1947年12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现在回头看就很清楚了：从这个文件发出之日开始，到反右派斗争为止，十年之间，共产党就是按照这个态度处理它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步一步实施这个既定方针。到了1957年，矛盾积累到了极点，终于给了他们毁灭性的一击。这些民主党派从此名存实亡，不再是一种多少有一点独立性的政治力量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整风运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以《这是为什么？》为题的社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写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就内容和性质来说，反右派斗争首先是算前一阶段整风运动的账，所以有“由整风转变为反右”一说。就时间顺序来说，也可以说整风是反右的前奏曲。我们在探讨反右派斗争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之前，要先看看整风运动。就我看到过的材料来说，最早提出要在1957年开展一场整风运动的，是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中央全会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起义之后几天召开的，听取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的报告，刘介绍了他如何同赫鲁晓夫商讨处理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情形。可以认为，这次中央全会就是为了讨论波匈事件而召开的。匈牙利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刺激，他当然极不愿意在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事件。他在会上提出开展整风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国也出现匈牙利事件的一项措施。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可以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呢？毛在1957年6月8日写的发动反右的党内指示中作了这样的说明：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即照此办理，在一些地方制造出“许多小‘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案是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升学问题上街游行，被人为地制造成一起民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处死了三个无辜者。这一案件有助于人们对毛泽东这篇文章的理解，他说的

### **“主动整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于这次计划中的整风运动的性质和做法，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对于人们理解整风运动的性质，这一段话真是太重要了：“整风，就是思想改造”。人们对于数年前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记忆犹新，而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原来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具体的做法，毛泽东说了一项：发动学生斗教员，人人过关。他把匈牙利那种群众上街的情形称为资产阶级大民主，那么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右派斗争这些了。

毛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不仅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也有国内甚至更是党内的原因。他在1958年3月19日为重印一批按语写的说明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



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倡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他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指的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国内方面”的“反冒进”事件，显然更是他希望通过整风运动解决的问题。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为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谈到在这年的下半年，“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毛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他就这样吹响了各行各业全面冒进的号角。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冒进的恶果大量显现出来，刘少奇、周恩来这些比较务实的领导人感到形势严峻，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篇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发表的社论宣称：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提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恼怒，在这一天的报纸上批了这样一些话：“尖锐地针对我”，“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七八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基调也是反冒进，其中提出：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为了这事，后来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例如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调侃地说：“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据报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从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改善党与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关系。但是从毛在这前后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知道，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之后，中国的这些民主党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装饰品。它的头面人物虽说大都安排了颇高的职位，其并没有什么实权，不能做什么实际的工作，更不要说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因而显得很是消沉。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之后，民主党派一时颇觉兴奋，他们就象经过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动活动了。1957年三、四月间，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开会：致公党（3月21—23日）、民主建国会（3月22—23日）、九三学社（3月22—2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月25—30日）、民主同盟（3月22日—4月5日）、农工民主党（4月12日）都开了会。讨论在这新气候下的工作问题。这里只举民主同盟的情况为例。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

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表示要更加广泛的参与国是。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却是毛泽东所厌恶的。这也就是后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不过这时他想要打击的还不是这些民主党派，而是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他想，是不是可以来一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民主党派哇啦哇啦提意见，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种消极因素，只是如果把他们提意见的积极性加以引导，使其锋芒针对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那就化为积极因素了。他怀着这样一种愿望，就来着手调动民主党派这个力量了。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整风指示》见报的前一天，1957年4月30日，他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党中央的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也都到场。毛讲话的主旨就是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了这样一些话：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尽管他对民主党派开的这些会并不高兴，但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夸奖了几句。他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希望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们在他划定的范围之内多提些意见，这就是对国务院所属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这些部门，也就是总理周恩来领导下的部门的工作提意见。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也就对刘少奇的系统多提意见了。假如这些民主人士能够多提意见而且符合他的意图，毛还许诺给予一份回报。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

这天毛泽东还讲到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他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也是知识分子很欢迎的意见。不过，后来凡是引用这话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整风指示公布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8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日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件事进一步反映出了毛泽东借重民主人士进行党内整风的意图。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成问题的是，这些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完全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并不在毛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对教育、卫生等等工作中

的缺点提意见，批评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义，甚至有人在发言中还流露出反冒进的意思，例如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就提出了“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的问题。会上的许多发言谈到党委代替行政直接发号施令、外行领导内行、肃反运动的偏差，等等问题，实际上涉及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体制问题和严重弊端。这些都是毛没有料想到也决不愿意听到的意见。

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共产党内的情况其实颇为隔膜，不知道（或很少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反冒进问题上的意见根本对立，而把他们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导集体，他们没有想到在提批评意见的时候要分别对待，在批评刘少奇、周恩来工作中种种错误的同时要赞美毛泽东的英明正确，表示对毛泽东的尊崇拥戴。像储安平的那篇要命的“党天下论”，标题竟是荒谬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陈铭枢甚至直接写信给毛，批评他本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种表现使毛泽东震怒。反右派斗争就从打击民主党派开始。

当年有机会经常接近毛泽东的李志绥在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简单化为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打击周恩来，李志绥的这个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确实知道这样几点：毛在发动整风运动之时确实想要同时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为了反击向共产党倡狂进攻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得不把反冒进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求得党内的团结一致。李志绥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林克（毛的秘书）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谈到为什么“反冒进”一阵风仍然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时候，他说，这是因为“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可见他无意于把党内反冒进的人全都划为右派分子，给一些人另外准备了观潮派和促退派这两顶帽子，罪名轻得多了，并且接着说，“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可能改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这种不为已甚的态度当然有助于全党团结一致去反右派。也因此，没有能够在整风和反右中去算反冒进的账。这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反右派斗争过去之后，毛还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又说：“‘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调侃周恩来，这在上文已经引用了。他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更说，有些同志不经合法手续，“即进行反对



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暴发，提出反冒进”。可见他一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进问题。这笔账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后的清算。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理由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前面已经引用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准确地表明了整风运动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是预告了：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的最后阶段。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要给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总结了，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真是说得简明扼要：“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反右其实是一回事，要说差别，不过是时间先后的两个阶段而已。

既然说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那么，开展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当然早就在毛的成算之中。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当初毛表示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究竟是真心诚意的求言呢，还是引蛇出洞或者说钓鱼的一种手段，阴谋或阳谋？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敌视是一贯的，从延安的整风和抢救到进入北京之后的思想改造和肃反，开展一场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说这一回的整风运动，他已经明说就是思想改造。当然可以认为在决定整风之时即有钓鱼之意，这事实上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或准备阶段。是知识分子不知底蕴，以自己最好的愿望去解释整风指示的文字，误入白虎节堂，自投罗网。毛泽东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大战”来指挥的，提出了要使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谋略。“引蛇出洞”不过是“诱敌深入”更形象化的说法，就是诱使那些将要打击的对象充分暴露自己。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呢？在《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说：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这里所说的5月8日至6月7日，正是从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到工商界座谈会结束的这两个座谈会期间。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具体部署反右派斗争了。引蛇出洞或者说诱敌深入就是战役的第一阶段。李慎之认为，这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他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说：“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1956年）10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他引证了毛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像“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毛的这些话当然表示他有引蛇出洞的意思了。但是我以为，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开展一场后来实际进行的那样的反右派斗争。我这看法有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在同一篇讲话中，毛说，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要剥夺他们的



政治资本，“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这些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李慎之在致胡绩伟的一封信里批评了我写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按：此书的增订本改名为《反右派斗争始末》），他说：（朱正）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倡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1997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这里，他不是照引我书中的原文，而是概括地转述。在我的书里，对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原因并不是说得这样简单。在他决定整风的多种动机之中，我提出毛一开始确实也包含想要消除那些太刺眼的弊端，改善一下执政党形象的愿望。这里也有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毛在5月16日写的一个党内指示。这时他已经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了，可是他在这指示中还是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毛即使在布置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就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要打出多少右派分子，7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一个党内指示的时候，写下了他对于“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的意见，他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到了8月18日，他在修改统战部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写的数字增加了许多：“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最后的实际战果，“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应该指出：这是给“错划右派”进行“改正”之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必定比当年实际所划的数字要少些。当年究竟划了多少，要等到他日档案公开的时候才知道了。不久前看到一个3178470的数字，我对它的准确性甚至真实性不无怀疑。这篇材料的标题是《反右派运动档案解密》，却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由什么机关宣布解密的，也不见档案号。再就内容看，所提出的数字也不足信。1957年那时，中国“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五百万左右”，那么这三百一十七万就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强了。在我这个过来人的印象中，没有这样高的百分比。在没有找到确证以前，暂且让它聊备一说吧。

反右派斗争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是它打出了多少右派分子，以及这许多右派分子及其亲友在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吃了多少苦头。而且更重要得更多的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或者如有的作者所说的是“大逆转”。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看作历史的分水岭的，他说，毛泽东的领导在“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而来的，是大跃进。毛泽东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情也确是如此。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

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

大跃进这一场新的灾难造成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千万计。毛泽东知道：大跃进的失败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大降低，于是决心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对手，重建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时他就在准备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了。以打倒刘少奇为重要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有材料表明：准备工作是早就在进行了。毛自己说过，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就看出了问题。谁的问题？当然是刘。准备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造）能够置刘少奇于死的罪证。李冰封的《吁天辩诬董狐篇》一文谈的是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63年1月被秘密逮捕的事。逮捕吕振羽的目的就是要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在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抗日的时候，刘少奇充当了内奸。所以李冰封认为，1963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各项准备完成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同他在1957年发动反右派斗争一样，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强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打击有可能向他的权力地位挑战的对手。在1957年，毛原来想借助为冲击力量的民主党派人士不明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不分老和尚小和尚一律批评，不但出现了对他本人的批评，甚至还涉及到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根本问题。他原本就认为民主党派怀有二心，这时候更感觉到虽然八年来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打压和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民主党派仍未归顺。面对着这种七嘴八舌纷纷议论的局面，他感到当务之急不是跟那些反冒进的党内对手算账，而是赶快把被他放了出来的那个魔鬼重新收进瓶子里去。于是以民主党派为第一个打击对象，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反右派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因此，在1957年，任何一个基层党组织，乃至任何一个党员，都是不能批评的，谁批评了就是向党进攻。因为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这些具体的支部和党员组成的。通过这样一场斗争，党的威势大大提高了；作为党的领袖，毛的威势更是大大提高了。这里我用“威势”一词，不说“威信”。因为有人说过，反右派斗争使共产党立了威，却失了信。到了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从一开始，毛就明确告诉人们：决不可把共产党看做一个统一体。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写下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更明确宣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来人都记得，当年那些大大小小的党内领导人几乎无一不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而受到冲击，这就同1957年的做法完全相反，不过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却是进一步大大提高了。

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的时候，毛还颇有一些自信。这时他执政八年，工作中积累的 error，群众中积累的不满，都不算太多。有错误，他以为也不过是某些党员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造成的，无损于整个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只要按照整风指

示说的，让大家在和风细雨中批评批评就可以了。到了反右派斗争中，甚至连这三个“主义”也不承认了。谁批评教条主义，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批评宗派主义，就是攻击党的领导……如此等等。用一顶右派帽子把一切批评都挡了回去。

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66年，工作中积累的错误就更多了。其中还包括大跃进这样的绝大错误，甚至应该说是滔天罪行，远不是可以用“三大主义”那样的轻描淡写能够解释过去的。这时，人们对大饥荒记忆犹新，心里都在想：这些错误乃至罪行是怎样造成的？应该由谁来承担罪责？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这样解决的：有一条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十七年间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切错误，灾难和罪行，都归罪于刘邓路线。毛要打击的一切党内对手，一切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归属于刘邓路线。这样强调党内的路线斗争，是1957年没有提出也不必提出的。

在1957年，毛原来想要利用的冲击力量是民主党派人士，可是他们太不识相，有负厚望，因而受到沉重的一击，早已溃不成军，尸居余气。到1966年时已经不成其为一种力量，毫无使用价值了。这一回被毛泽东找来作为冲击力量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看来这是他因为有了1957的记忆而作出的决定。在1957年部署整风和反右的时候，最开始，毛并没有想到学生。是5月1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学报，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他们自豪地称为“五·一九运动”之后，才引起了毛的重视。在5月19日以前，毛泽东写的有关整风和反右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到学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别的一些大学的学生们，出大字报，办民主论坛，闹烘烘，使毛泽东大伤脑筋，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酝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回忆起1957年这些娃娃们为了自己认准的“理”而奋不顾身的勇气，觉得可以用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力量。于是所谓“红卫兵”就应运而生。他们之中多是大学生、高中生，甚至还有初中生。他们更年幼无知、更轻信、更容易被煽惑。他们不但不知道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连中共执政以来十七年的历史也不甚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父兄的遭遇中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但被告知这是受到刘邓路线的迫害，于是他们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他们成群结队，四处抄家，打死老师，破四旧，闹得乌烟瘴气。他们的这种种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都被称赞为革命行动，受到鼓励。在他们的冲击之下，各地党委在很短时期内就瘫痪了。“红卫兵”做到了毛希望他们做的事。文化大革命当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会，都是1957年经验的直接继承。毛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采用这种革命形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对这几样是如此喜爱，后来甚至把这些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写入《宪法》之中。直到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才有了一个新说法。他说：“‘四



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

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他说的是“从来”，就是说，这个“四大”不论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从形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跟反右派斗争相似之处甚多，只是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受到冲击的人更多，造成的破坏也更大。在这个意义上看，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预演。

在1957年，毛泽东把他提出的“百家争鸣”解释为“两家争鸣”：“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照这样的解释，所谓“两家争鸣”，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思想后来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可见就指导思想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延伸和发展。

毛泽东想要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对手的目标，在1957年没有能够达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达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流产的文化大革命。同1957年那时不同的是，随着刘少奇及其同事在弥补大跃进灾难性后果过程中威信日益升高，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变得更加强烈与急迫。十年之后，“霸王”的毛泽东终于腾出手来，开始了他自己视为一生中在打倒蒋介石之外的第二件大事，即发动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的的文化大革命。

## 揭开当代秦始皇的面纱

### （《读书札记》中有关“反右”的片断）

#### 佚名

反胡风运动后就是肃反运动，再接下来就是更大规模的“坑儒”——反右运动。

辛子陵提的55万右派，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据媒体披露，1958年5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宣布，反右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抓出右派分子3178470人，中右1437562人，计461603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实际上，反右运动1959年春才告一段落。我们县1959年初，教师寒假集中学习，还抓了一批“漏划右派”。到底全国抓了多少右派？据媒体披露，被判刑的有4万多，送劳教的有48万多。据我所知，有一批被开除公职送农业社或工矿监督改造，还有一批撤职发生活费送农林牧场、工矿或留本单位监督改造，对原先的“显贵人物”则撤职养起来。总计该有多少？

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同时，相继在农村搞“大鸣大放”，在企业 and 少数民族中以及中等学校学生中进行“整风和社教”，其方法是“大鸣大放辩论”。在“大鸣大放”中，将参与者按四类排队：一类，对社会主义忠诚坚定积极；二类，比较好的；三类，对社会主义有严重抵触情绪；四类，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所谓“大辩论”，实际是组织群众对被划为



四类的人进行狠批狠斗。后来，中央下发文件，在工人、农民和中学生中不划右派，称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据我县党史记载，全县有 3752 名农村社员（不含工人、城镇居民和中学生）被划为“四类”受到批判斗争。他们不叫“右派”，又享受了右派分子的某些待遇：工人、农民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当“坏分子”看待，中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学籍。

我们县是贫困山区县，知识分子少，在五十年代，中小学教师都需要从其他县调入。反右运动的“成果”也颇惊人！据县志记载，“全县被定为‘右派分子’的 934 人。”据我所知，这只是“右派名册”上的数字。实际上超过 1000 人。一是原私营工商界的右派（如中药店“同昌祥”的老板刘某某等）没拿国家工资，没上“右派名册”，由工商联处理，一律改干粗活，只发生活费；二是有几个扫盲教师（如鲍伯威等）反右运动时在农村扫盲，处理右派时被“下放劳动锻炼”，实际上享受其他右派一样的待遇，有的还被“精简”回家。1979 年右派“改正”，恢复原工资级别，他们因没进入“右派名册”，不能享受“改正右派”的待遇，到 80 年代初，在职的才恢复原工资级别，被“精简”的才给予提前退休的待遇。三是有个别干部（如县供销联社的李宝文等）因得罪过某领导，反右运动中，并没经县委反右领导小组审批就宣布他为右派，和其他右派一起被送到林场监督改造，“改正”时查档案，才发觉他们没进“右派名册”。四是有几个老教师（如刘敏初等）因“历史不清白”，反右运动中格外小心，没“辫子”可抓，没戴右派帽子。在处理右派时，只公布了他们的历史，没加任何“罪名”就宣布开除公职。有的送农村监督改造，有的送成昆铁路建筑工地劳教。

抓右派也有指标。各级领导为显示自己“革命”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例如：北大划的右派有 716 人（教职员 120 人、学生 596 人），占教职员和学生总数的 9%（加上“中右”有 1500 多人）；兰州大学划的右派占教职员和学生总数的 14%；司法部划的右派高达 23%（也许太触目惊心了，将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赦免了，“货真价实”的右派仍占 16%）；《文汇报》驻京办共有 10 人，7 人被打成右派，其余 3 人定为“内控分子”。我们县地处川鄂交界的高山区吐祥乡小学划了 5 个右派，县文教科的科长、副科长、科员加上两个教研员（小学教师）总共 8 人，划了 4 个右派。

当年的知识分子有多少呢？毛泽东在 1957 年 3 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供了一个数字，全国包括高小、初中毕业在内的知识分子 500 万人。就以官方公布的 55 万多右派分子来计算，小学生都计算得出知识分子中划的右派占多大的比例。

一人被打成右派，其亲属朋友和同情者都要受株连。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一家人无一幸免，仅北京市因受其株连被打成右派的就有 170 多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无法估计。

那年代，无论什么人，只要动笔或开口发表意见，都可能中“阳谋”。鲁迅在国民党执政时，发表了大量批判时政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若是活到 1957 年，会有怎样的遭遇呢？1957 年夏，毛泽东的湖南好友罗稷南在上海的一个座谈会上问毛泽东：“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以我的估计，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惊出一身大汗，不敢再做声。

反右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民主党派（民盟中的右派 6000 多，占盟员总数的 1/5；民革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中的右派占 20.2%）和知识分子，也有中共党员干部，其中有省委书记和省长（如浙江的沙文汉、青海的孙作宾、安徽的李世龙，等）。

和尚尼姑本是“出家人”，也没逃脱这场灾难。仅成都市的右派名单中就有和尚 39 名，尼姑（比丘）1 名。佛门泰斗本焕、虚云大师、佛源和尚等都被戴上右派帽子打进牢房和牛棚，不准他们念经。右派分子中的神甫、修女、牧师、阿訇也不少。

右派分子中有百岁老人，还有少年儿童。

1958 年初，已满 107 岁的吴德正大阿訇（1851—1959）参加阿訇集训，遭到批斗，戴上右派帽子，交生产队监督改造，1959 年含冤离世。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虚云大师（1840—1959）118 岁时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1959 年圆寂。

云南昭通的李曰垓 15 岁被划为右派。他生于 1941 年 12 月 23 日，13 岁初中毕业参加革命工作，任专署机要员。1958 年元旦刚过，他接到通知，下放到一山区农场劳动锻炼。他背着行李，踏着冰雪，走了五天到农场报到。农场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右派，编入右派劳教组，明天出工。”李曰垓惊诧莫名，响应党的号召，整风运动中发过言，怎么会是右派呢？他决定立即逃跑上访，结果被抓回，度过了 20 年零 8 个月的铁窗劳改岁月。

四川达县城关镇小学五年级学生张克锦 12 岁被划为右派分子（人们称之为“右童”）。大鸣大放时，达县城关镇一帽鞋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给镇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一手遮天的 xxx》。冉某被打成右派遭批斗，被逼跳桥自杀。随后查出那幅漫画是冉某请邻居的孩子张克锦画的（张克锦的漫画作品在县里得过奖）。12 岁的“右童”分子被投进监狱关了七年，直到 1979 年才摘帽。

其实，“右童”张克锦并非特例。《南方周末》和《大堡小劳教》中就写了一个儿童被打成反革命送劳教的“故事”。

1955 年，四川温江县庆丰街小学出现反动标语，学校没查出任何线索，就把年仅 8 岁的学生李久弟抛出交差。因其父解放前曾当过县参议会副参议长，1950 年就已“下落不明”。

校长把李久弟喊去，叫他回家不必来上学了。1956 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劳教的指示。1958—1959 年，李久弟被抓到县看守所，警察告诉他：你在 55 年写过反动标语，是反革命分子。李久弟还不知学校什么时候出现过反动标语，也不明白什么叫“反革命”。县公安局将李久弟的年龄由 11 岁改为 13 岁，送到省公安厅主管的峨边县沙坪劳教农场大堡作业区劳教。大堡作业区是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童而创办的，里面关押了五、六千小劳教人员，最小的 9 岁，最大的 17 岁。他们每天上山开荒种地。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一个不到巴掌大的玉米饼（薄薄的一层玉米粉皮包着野菜）。他们只得偷吃未成熟的粮食、种下的种子（拌过毒药），甚至老鼠、屎壳郎。因高强度劳作、饥荒、疾病和虐待，差不多天天都在埋死人，最多的一天埋了 30 多个。总计死了 2600 多个小劳教！1961 年才陆续解除劳教，1962 年大堡作业区才撤销。李久弟有幸活了出来，改革开放后当了个体户。他还多次到大堡看望埋在那里的“难童”！

通过反右运动，更加显示了当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的威力。从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到小

学生，从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和尚尼姑，都得对他服服帖帖。六亿人民只能一个脑袋，一个声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头子。1962年夏，刘少奇激动地对悠哉游哉地泡在游泳池中的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随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批判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黑暗风”：“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我周游了全国……并非一片黑暗。”不久，刘少奇就成了“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

大跃进是反右运动的延续。反右运动中的“左派”在大跃进中创造的“奇迹”也特别惊人。河南抓右派居全国之首，大跃进又是一马当先。河南抓右派 70896 人，占全国 55 万的 15%；大跃进时，河南饿死 300 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抓右派 8696 人，占全省 1/9，结果饿死的人也多，全地区总人口 850 万，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10 月就饿死 107 万多。四川省抓右派 50279 人（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共青团组织帮助各级党委抓的青年右派就有 53700 多人，实际上抓的右派超过 12 万人）。大跃进饿死 940 多万人（据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的起码有 1250 万人），饿死人数名列全国第一。川西的荥经县，山河秀美，物产丰饶，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家家现浮肿，户户有死尸，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据《荥经县志》记载，1958 年全县有 63717 人，到 1962 年，只剩 29850 人，饿死了 34000 多人，减少 53.15%。那几年还发生过 40 多起吃人肉的特殊案件。安徽抓右派 31479 人，除 187 人外，全部送劳改或劳教（由此可看出他们对右派的残酷）。饿死 633 万多人，占总人口的 18.37%。按比例，名列全国第一。本是鱼米之乡的无为县，全县 982979 人，饿死 320422 人，占全县总人口 30.6%。凤阳县 40 万人，饿死 9 万多，约占 1/4。甘肃省抓右派分子 11132 人，将 3000 多右派关押在夹沟边劳教农场，到 1960 年底，只剩下 300 多个了！甘肃共有 1500 多万人，饿死了 130 多万人。通渭县是个小县，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 1/3，死绝户 2168 户，留下孤儿 1221 人，70%的家庭有人饿死，发生过母亲吃女儿的凄惨事件。

## 1957：鸣放小报《真理塔》

朱泽觥

谢泳先先编著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一书中，有一篇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的《内部参考》（1949-1964 年）等资料写成的文章。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该文说：“1957 年西南农学院有四个学生，以‘真理塔’为笔名，在学校举行的自由论坛上，以《请党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计农民的革命性》为题，四人分段做了演讲。”

“这个纲领性的发言很值得注意，受到了许多教授、讲师的赞同。……它对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要求，却说了一些真话，特别是对农民的真实生活处境，有很深入的分析。”

“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的负担已经很重。”“他们文章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他们提出了农民应该组织自己的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参政……”“他们认为，当时的所谓工农联盟，在政治上发生了矛盾。由于农民没有自己的政党，因而在政协、人代会以及政府中没有真正的代表，不能将他们的要求在这些会议中充分讨论，以作出相应的决定来满足农民的广大要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工农联盟在经济生活上发生了较大的差异，使政协、统战、工农联盟有形式无内容，使政治生活中不能体现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我们认为工农联盟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在他们提出的具体建议中，对多给农民保留自留地、提高农产品价格等问题多有涉及。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末中国农业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没有超出这个纲领。”

这是谢泳根据《内部参考》1957年2234期第9-11页所载资料《西南农学院的四个学生发表纲领演讲》一文所评说的。

我，就是那四个学生之一。在这里，让我把当年鸣放中农学系二年级三班创办的鸣放小报《真理塔》及其刊载的“毒草”作个历史性的回顾吧！

1957年的5、6月间，中共整风运动开始了。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农学院也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了鸣放高潮。农学系二年级三班的学生们，是一群对党的事业痴心不二的热血青年。怎样积极地投入到帮助党整风中去呢？十多位同学围聚在学生宿舍二舍124室里讨论开了。有的同学对学院在教学、管理、基建以及学生生活等方面提出了意见。有的同学则提出，我们是学农的，除了针对学院党委的“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出意见帮助学院党委整风以外，更应关注农民、农业问题，向党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同学中，有几位家住在农村，有几位是从中专农校保送来的，他们比较多的接触过农村。当王隆瑛等同学把自己回家耳闻目睹的农民苦、农民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状况向大家作了介绍后，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致认为：应该向党中央反映，说说我们的看法和意见。

这时，在停课鸣放中学院内鸣放小报出现了。有同学提出，我们也办个小报，把我们的看法和呼吁登上去吧。大家一致同意。可是，小报取个啥名字呢？文章写些啥内容呢？由谁来写呢？对于小报的名字，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当阮圣宏提出取名“真理塔”时，正愁取不好名字的同学顿时眼睛为之一亮，兴奋了！好！要得要得！用真诚，讲真话，求真理，向“三害”作斗争！名字取好了，文章写些啥呢？谁来写呢？又经过几次认真讨论，决定写三篇材料。一篇是呼吁党中央重新估计农民的革命性，此文由上学期的文体委员朱泽航写；一篇是分析工农联盟“处于不稳定状态”，由该班的共青团支部组织委员赵裕隆写；另一篇则由班上的共青团支部书记王隆瑛写，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试探性纲领”。

不几日，这三篇文章写成了，与时任班长的吕金庆等人商议修改后，“亮相”在1957年6月9日《真理塔》创刊号上。

《真理塔》发刊词说：“农民实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而党中央在对待农民的政策上实又存在着问题。为此，我们创办了《真理塔》来开展农民问题的讨论，欢迎老师同学们踊跃参加。”

与此同时，这一期《真理塔》还刊发了“我们《真理塔》的纲领。”



所谓的“纲领”是：“遵循党中央对于整风运动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本着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原则，来对党的各项工作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进行鸣放，帮助党整风”，“要以全中国六亿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向‘三害’进行斗争。”

又说：“我们是学农的人，因此最最关心农民问题”，“产生三害的最大根源是党中央的三害。因此，我们觉得应该对党中央的三害进行斗争。不仅如此，我们也要对我们学生的切身问题进行放和鸣，向学校的党委会进行放和鸣。”

创刊号的主角当然是那三篇文章。就这样，《真理塔》把“毒草”放出去了，竟把矛头对准了党中央。到头来，这群对共产党毫无二心、坦荡直言的毛头小伙不当替罪羊就怪了。14名《真理塔》成员中，吕金庆、朱泽觥、王隆瑛、赵裕隆，通通被划为右派，通通开除团籍。还有一位治病后复学插到了这个班的杨先道，积极参加了《真理塔》的鸣放活动。并围绕农民问题去学院组织的“论坛”演讲，提出“组织农民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参政”、“组织了农民党更有利于工农联盟”。他认同“农民生活苦”，“工农联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等观点，还说“肃反不应机械地抓住5%的对象。”于是，右派当定了，团籍开除了。现在看来，有些话谁叫他们早说了二、三十年呢？为存史，不妨原文照抄，在这里“回放”一下。

### **第一篇：党中央应重新估计农民的革命性**

以往我们说，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革命最坚决，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身受三重压迫，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向上的最先进的生产力。现在解放了，造成他们“最革命”的客观条件没有了，他们仅仅还与大生产保持着联系；同时，由于革命的胜利而使整个工人阶级的成分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大大的增加了，而且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在经济上翻了身，再也不是“无产”的穷光蛋了。几年来，党口口声声宣传工人阶级绝对正确绝对优越，宣传农民自私、保守、落后，我们觉得问题不应该这么说了。农民应该是最革命的阶级。

看吧，农民不仅随着工人阶级革过命，当过所谓的“同盟军”，而且现在最积极地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最积极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最坚决，最少顾虑。如果说他们过去保存了革命的火星，使革命没有绝种，而且逐渐由农村包围城市而取得了胜利，那么，他们现在缴公粮，卖余粮，上夏征税，买公债，卖猪羊，他们不在支援着工业建设吗？他们不是最积极的革命者吗？然而他们喂肥了猪，但最少吃肉；他们辛辛苦苦种了水稻，而最少吃米。他们支援了工人支援了城市，他们忍饥受饿、节衣缩食地来建设社会主义，这难道还能罪加于农民革命不积极吗？再看看工人，他们伟大，不错；他们生产了钢铁，不错；他们重要，不错。但是，他们再伟大却不能生产出粮食叫人们不挨饿。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比农民吃的好、住的好、穿的好？他们有什么理由挂个金牌——“最革命”？

现在，小农经济不复存了，农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被堵死了，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可能表现“动摇性”？为什么还称他们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我们的党为什么说他们“既革命又不革命”？如果说他们生产方式落后，如果说他们代表了落后的与社会蒸蒸日上的面貌不相容的生产力，那么，我们的党又为什么不更加积极的来使他们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呢？如果说这是由于我国解放不久，国家力量不够，为啥又大大的优先于工业呢？这一切的

一切，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不能不使我们不满。我们要求，农民应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参政。我们要为农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呼吁，望重新估价农民的革命性，并且从各方面来加强对他们的关心。

这篇直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组织起农民政党的“毒箭”，后被选入《重庆右派分子言论集》。署名吕金庆。其实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为朱泽觥。时任班长的吕金庆被打成极右后，由于不服，说他有“破坏”行为，于1958年4月3日被捕入狱，劳改二十余年。好在命大，终于得以“改”了“正”。然而，自恃出生在革命家庭的、对共产党忠心不二的、中专毕业后被选送到西农读书的朱泽觥，满怀激情地在全院鸣放“论坛”上代表《真理塔》宣读了纲领，又对学院教学、基建、团支部工作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便与吕金庆一道被首先揪了出来，所幸院党委“刀下留情”，没有给予极右处分。

### **第二篇：关于工农联盟矛盾问题**

工农联盟在经济上发生矛盾——农民劳动时间多于工人，工人收入多于农民，工人劳动价值多于农民，同时统购统销只统细（粮）不统粗（粮）。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照顾农民不够，同时提高工农生活也不全面，对于工人好处多，农民好处少，使得工人与农民的经济生活发生很大的差异。

工农联盟在政治上发生矛盾——由于没有农民自己的政党，因而在政协、人代会以及政府中没有真正的代表（有少数是共产党员），不能将他们自己的要求在这些会议中充分讨论，以作出相应的决定来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宣传说农民流入城市就影响工农联盟。我们觉得没有找出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把不应由农民负担的责任加在农民身上，这是不公平的。解决办法是不全面的，加之以工农联盟在经济生活上发生了较大差异，使得政协统战、工农联盟有形式无内容，在政治生活中不能体现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我们认为工农联盟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应该重新估计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党中央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而深入的调查不够，只收集部分地区资料，没有收集更广泛的资料而作出对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路线和政策。我们考虑它是否能真正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情况，是值得怀疑的。希望党中央对此重新估计。

此文为当时的共青团支部组织委员赵裕隆所写。虽无特别深刻的分析，但是斗胆挑战了工农联盟，也就是挑战了人民民主专政，挑战了农业合作化，挑战了党的领导。于是，尽管赵裕隆出身贫农，又是农业中专保送大学读书的高材生，补划右派，也就难免了。后来到四川省南充地区的一个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种子工作，郁郁而终。

### **第三篇：本刊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试探纲领**

- 一、 贯彻党员领导，老农治社，乡干部参加生产。
- 二、 集中拖拉机，大力开荒，兴建国营农场，增加粮食，鼓励移民。
- 三、 增加化学肥料的供应，压低化学肥料价格，是解决生产的重要手段。
- 四、 提高农民社会政治地位，给予真正农民的参政机会。
- 五、 扩大对农业的投资。

- 六、 扩大自留地，鼓励发展社员副业。
- 七、 停业或减少向农民发行公债。
- 八、 停业或减少对农民的夏征任务，保证青黄不接时无断炊之势。
- 九、 提高农产品价格，特别是肉类、棉花、菸草等。
- 十、 粗细粮同时统购，多留些细粮给农民。

十一、 组织政府中级以上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中级以上军官下乡看看农民，自动提出降低薪金待遇，鼓励全国干部将多余薪金作为农业投资。

十二、 组织政府工作人员下乡参加劳动，克服官僚主义。

十三、 广开乡路，增加土特产出口，减少大米出口。

十四、 积极训练合作社干部，增办干部训练班。中等农业学校向合作社中的优秀劳动者，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开门，从干部上技术上保证农业生产。

十五、 继续贯彻党中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十六、 奖励农业革新者。

十七、 农业科学研究机关面向实际。

此为时任共青团支部书记的王隆瑛写出。原为 10 条，后增至 17 条。反右后期，“增补”为右派。后到四川的一个县的区农技站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发愤图强，刻苦工作，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被评为全国绿化劳动模范，当了十多年“七品”官。

《真理塔》共出刊五期，于同年 7 月 7 日终刊。它放出“厥词”五十多年了，现在回头来审视这些文章，虽有偏激，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又缺乏理论高度。但，这毕竟是提前三、四十年知无不言的真话，这一群“政治上热情而尚不成熟的青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第一版第 460 页语），怎么会料到言者有罪，以言定罪呢？他们终于倒在了“阳谋”之下，历经二十多年“脱胎换骨”，始得“已改邪归正”成“正果”。改正改正，“改”亦难“正”。呜呼！又多言了！

2011 年 9 月 9 日

（编者按：此文首次发表于本刊，作者为重庆开县政协退休干部）

## 绝处逢生

### ——苦难的右派生活

萧至刚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在开县中学被反成右派，处分是撤去教师职务，降为勤杂人员，每月发给生活费 20 元。

一九五八年三月发放到边远山区岩水区岩水乡麻柳大队劳动改造。劳动了五个多月，九月，全民大炼钢铁，全县在岩水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全部转移到白泉乡蔡弯运输铁矿。从此，更大的苦难降临到我这些右派分子的头上。

白泉乡是岩水最高最穷最偏远的地方，距麻柳大队大约一百二十余里。接到通知大约是上午九点，限定次日中午以前赶到蔡弯。麻柳大队共有右派8人。征调的还有全区各乡农民。去蔡弯的人络绎不绝。纷纷传说蔡弯发现了大铁矿，藏量数十亿吨。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路上是行人已经稀少，民工都已走在前头。麻柳的八个右派也各自走散。我挑着一口小箱子一个被盖卷落在了后头。饥饿加疲倦，我拖着脚步勉强前行。路边做活的农民提醒我：“走快点，天一黑，过不了猴攀岩。”我努力加快脚步。

穿过一片树林，突然眼前一空，面前一座山谷，两山相距三五百丈。谷中河水发出吼声。日头西斜，阳光照到的地方两岸峭壁悬崖。下半山谷阴暗迷蒙，看不到谷底。从山岩上凿出一条路来，呈“之”字形，二三丈一拐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曲折下行，坡度在45度以上。路宽二尺左右而且很不平整。前面有人陆续下走。挑着行李磕磕绊绊是不行的。我把木箱被盖绑在一起，背在背上，将心一横，向下走去。靠紧岩壁，抓着小树小草，扣紧岩缝，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去。不敢看眼前悬空的一面。下行三五十丈，紧张的心情刚刚放松一点，突然传来“啊——”一声惊叫，接着听到“碰——！碰——碰！”连响数声，立马有人喊道：“摔死人了！摔死人了！”我心脏紧缩，头皮发麻，一下坐在石梯上面。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样走到岩底的。到我淌着齐腰深湍急的河水走过河去时，天色已近黄昏。爬上山岩，不远处有座茅屋，我在这个农户家借住了一晚。他家三人只有一架木床，一床破棉被。天色已黑，我无法再走，结果在他家堆放包谷壳（玉米皮）的小屋内，藏身包谷壳中睡了一晚。

几天以后才听说摔下岩去被河水冲走的人，也是一个被发放到岩水劳动的右派。据说姓赵，过去在县联社工作，又说是县工会的人员，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是死在岩水区的第一个右派。

一下集中几千人到蔡弯挖矿运矿，首先是生活严重困难。蔡弯地广人稀，没有住处。只有几户人家，房屋窄小，茅屋檐下都住满了刚来的民工。虽然搭了十几座竹棚，仍然容纳不了，好些民工只得住岩洞之中。缺乏粮食，缺少锅灶。每人每餐只分给一碗半生半熟的红苕，半碗盐开水，没有蔬菜。根本无法吃饱。也不供应开水，渴了就山沟里捧水解渴。根本没有道路，又加经常下雨，凡能通人的地里都被践踏得稀泥烂洞。稀泥齐脚背，穿不了鞋，只能赤着脚。艰难地从稀泥拔出一支脚来，拔得“噗哧”一声，才能跨出一步。肩上挑着担子，一溜一拐地一步一步地走得痛苦艰难。

民工从四乡调来，缺乏组织，一片混乱。但劳动卡得很紧，各个山头站着监督岗哨，手持话筒，不断喝喊：“不准打站！不准偷懒！那个穿烂短裤的走快一点！那个包白帕子的不要站着！”只得拿命去拼，摇摇晃晃步步前行。

虽才九月下旬，气温不断下降，阴雨霏霏，有时雪花飘落起来。十有八九的民工没有棉衣，衣服破烂单薄，难以蔽体。饥饿，寒冷，劳累，病倒不少的人。缺少医生，缺乏药品。进入蔡弯不过半月开始死人。怨声四起，民工开始逃亡。几个干部，莫可奈何。在蔡弯总共不过二十多天，听说死了八九个人。

我也住在竹棚里。竹棚全由百家竹（一个细长的竹子）绑扎的竹板做成。室内上下两个楼层，直接睡在楼板上。连铺而睡，每层可睡六七十人。地面由田地平整出来，泥土松软，



也被践踏得稀烂。

民工都是山区农民，极其穷苦，大多衣不蔽体，不但没有衣穿，普遍没有棉被。晚上八个一堆，十个一圈。烧火取暖。木柴是刚刚砍下的树枝与茅草，燃不起明火，烧得烟雾腾腾。升到楼上，无门无窗，满屋浓烟。我睡上层，被熏得睁不开眼睛，连连呛咳，无法呼吸。我用毛巾打湿，把头脸完全蒙盖起来。白天还得劳动，不睡不行，非睡不可。勉强去睡，刚刚睡着就被呛醒。极度疲乏，睡了呛醒，醒了一会儿又迷糊睡去。整晚整晚如此折腾，每个晚上这样折腾。

几天下来，我体力衰退，疲劳到了极点。头脑昏沉，全身酸痛，四肢无力，走路提不起脚步。民工可以逃亡，可以躲进山林，洞穴。我是右派分子，一进蔡弯干部就打过招呼：“你们这些右派，要规规矩矩，好好劳动改造！”干部对我们这些右派特别监视着的，常常拿一支眼睛挂着，我能够怠工么？有什么办法？就是死，也得拿命去撑着。加上这些天，时晴，时雨，还有时下雪。没有雨具，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还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怎么经受不了？我终于倒了下来。

大概是进入蔡弯的八天晚上，我突然发烧，一身疼痛，第二天温度更高，全身火热烧得胡言乱语，神志不清。同在麻柳劳动的八个右派各自分散。同住竹楼的民工每人都是早出晚归，倒头就睡，一个也不认识。没人问我，没人管我。我没有水喝，没有药吃，没有饭吃（也吃不下饭）。昏昏糊糊，躺在那里。一天，两天，三天。直到第三天中午时分。我半迷糊中感到一个冰凉的东西放在额头。勉强睁开眼睛，起初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过了一会儿才看清一个妇女蹲在我的身旁。见我醒来，端过一碗温水扶起我的头，喂给我一口，一口把这碗水喝完。我已几天没喝一口水，又发高烧，嘴唇开裂，舌头枯焦，喉咙干燥。这水如同清凉的甘露，救命灵水，一碗喝下，感到头脑一清，全身轻松了许多。她端过一碗面条，打算喂我，但我吃不下去。

这妇女四十多岁，是我们这个伙食团（每个伙食团管百多个人，全蔡弯可能有二三十个伙食团）的炊事员王大姐。她为人和善。没有食堂，端着碗在露天吃饭。王大姐掌勺给大家发饭。她可能见我与一般民工有点不同，问过我的情况，知道我过去是教师，犯了错误，才来这里劳动。见我两三天没来领饭，知道我病了，才煮了面条端了水来。

当天下午，王大姐又去到一里多外的指挥部临时诊所，给我要了药来。接连几天，天天给我送药，送水，送稀饭、面条，在她的殷切照顾下，我才逐渐退烧，逐渐好了起来。

王大姐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而且知道我是右派，却不顾影响不怕麻烦这样来照顾我。她太善良，太富于同情了。如果不是她的救助，我一定死在蔡弯那个竹棚子里的楼上了。

直到现在，对王大姐这个善良的妇女，我充满了感激。

刚刚一个月，十月下令撤出蔡弯，原来挖出来的矿石质量太差，无法炼铁，而且道路不通也运不出去。堆在一片洼地像山一样。不仅劳民伤财，七八条农民的生命白搭在这里。政府行为为什么如此草率。但这不过是大跃进中，中国大地上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已。

离开蔡弯，我们奉命转移到岩水区花梨铁厂继续劳动。转去的右派共三十三人。花梨铁厂厂址原来是一座庙宇，条件比蔡弯好些，起码有房屋可住。三十三名右派全部分到运输车

间。每月粮食供应四十五斤，基本可以吃饱。但管理非常严格。任务是运矿运煤。指定一个姓郑的右派作为组长，每个右派分配了定额任务。运输方式分两种，推鸡公车和肩挑。山路肩挑，挑到公路用鸡公车推。我的定额每日 280 斤。两种方式同时运用，先从山上把黑炭或矿石运到公路装车，必须往返三次，三挑才能装满一车。三天一结账，完不成任务受严厉处罚，扣饭，罚跪，挨打。

三座高炉日夜燃烧。全厂运输工人三百多人。起先不很吃紧，不久粮食供应减少，45 斤——40 斤——35 斤——28 斤——24 斤。肉食没有，蔬菜没有。每日往返少则七八十里，多则百余里。大雨，小雨，下霜，降雪，不得稍停，节日假日，年关春节一律取消。民工开始逃走，日益增多。有时出工的民工不过二三十人。厂方无计可施。三座高炉的燃料矿石每日消耗四五万斤。主要任务几乎全部落在三十多个人右派身上。

一九五九年，右派开始死人，而且连续不断。

第一个，陈克相，念过金陵大学，开县初二中生物教师，平日不读书，不看报，不问时事。批判“储安平党天下”右派言论时，他开会迟到，学习组长问他对“党天下”有何看法，他连连点头：“是党天下，当然是党天下，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反成右派。

一日大雪纷纷，道路泥泞，天色已晚，又累又饿，他把鸡公车上的黑炭卸下二三十斤放在路边，准备次日运回。被右派组长郑 XX 举报，立即被吊起拷打，两支手腕神经断裂，生活无法自理，再被扣饭，命丧黄泉。

第二个，刘炎文，二十一岁，中专毕业分配来开。过去身强力壮，进厂以后日渐消瘦，到五九年秋已十分衰弱，两次结账都未完成任务，又向农民买了几斤粮食。被认为是消极怠工，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斗争会上，遭扁担乱砍，倒地哀嚎，再被扣饭，十多天后死在床上。

第三个，王小寒，成都人，父母是大学教师，中专毕业，一九五六年分来开县农业局。五七年反成右派。高度近视，体形文弱，进厂以后积极劳动，受过表扬。五九年底已形销骨立，一日大雪漫天、寒风怒吼。一早出工，从此未归，不知死在哪条小路，哪个山谷。死后，无人问过。年仅二十一岁。

华年嘉，蔡文渊、赵永秋、盛德俊……一个接着一个死去，好些倒死在路途之中。

我不愿挨打受辱，拼死命劳动。一九五九年冬小便尿血，腰部剧痛，终于倒在路上。

一九五九年底在岩水区诊所住院治疗。所谓治疗不过停止劳动，卧床休息。因为全诊所只有一个医生，一个农村姑娘充当护士，除了阿司匹林、头痛粉之类，没有其他药品。病号每月只供应口粮 12 斤。12 斤中搭配豌豆或者胡豆五六斤。油无一滴，蔬菜没有。有病又饿，不是病死，也得饿死。

同室病人原先五个，都是在花梨铁厂劳动的右派。出院了两人，剩下三人，一个是我，一个叫杨纯，一个叫盛德俊。盛德俊年近五十，个子矮，体力弱。三人基本病因都是劳累过度，加上长期饥饿，极度衰弱。但盛似乎还有其他疾病，常在梦中痛苦呻吟。他沉默寡言。我们也精神委顿，不愿说话，彼此之间很少交流。

岩水山高地寒，入冬以后，常常下雪。窗户纸是破的，下雪风大，冷风在室内盘旋，温

度在零度以下。洗脸盆中的水一夜之间冻结成冰块，终日不化。被盖很薄，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每日两餐，每顿二两粮食，无油无菜。如是豌豆、胡豆，更没几颗。吃了调起食欲，更加饥饿难忍。吃，吃，吃，成了日日夜夜的一切想念，一切要求。我们每个人都瘦得皮包骨头，举动艰难。每天除了吃饭时起床一会儿，白日夜间都躺在床上，蜷缩一团。

到了腊月，盛德俊的病情更重，进入中旬，他起床解便都很艰难，偏偏倒倒，扶着墙壁才能走到墙脚马桶旁边。再过几日已不能起床，经常嘀嘀咕咕，胡言乱语，但听不清楚说的什么。后来，连饭也不吃了，送的饭，放在床头，一动未动。第二餐送来，炊事员发现未吃，他把上次的拿走，新送来的放在床头。第二天仍然未吃，干脆不再给他送饭。大约第三天上午，医生来听诊一下，医生问话，盛德俊一声不吭，可能已进入半昏迷状态，不能说话。医生摇摇头走了，没有给药，当然更谈不到什么抢救措施。毛泽东说过：“右派分子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右派分子的命不值钱，何况岩水诊所本来就缺医少药。医生可能也是莫可奈何。

杨纯与炊事员有点什么关系，盛德俊看来已无可救药，他搬到炊事员那里去了。室内更加空荡，只剩我和盛德俊两人。那晚上半夜盛德俊又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下半夜渐渐没了声息。第二天十点左右炊事员给我送饭来，他走拢盛德俊看了看，说了声：“死了！”回身走去。中午医生来了，也只是在床前看了看了事。问了我关于盛德俊的情况。我只知他原来是县工商联的干部，家住教门街，其他一无所知。医生说：“我通知他家属来收尸。”

医生走后，一连几天，毫无消息。

这间病室相当宽大，有四五十平米，原先不知作什么用，成立岩水区诊所以后，改作病室。泥土墙壁，毗口裂缝，木格子窗户，原先贴有报纸，现在多处破烂。我们向诊所提出过，请求修补一下，但是不行。炊事员说，一是没有面粉可作浆糊，至少也得斤把半斤。二是没有纸张。

病室窗下一侧一张床位。两壁一边排列两张单人木床。我与盛德俊的床头相连，相距不足一尺，可说是抵足而眠。

盛德俊死后，炊事员把他的被盖拉上盖住头部，被子短，盖住了头，两只脚伸出被盖以外。颜色惨白，一层皮紧紧贴在骨架上面，每根骨头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日下午再没人来，窗外连过路人的脚步声都没有，一片死寂。唯一的聲音是风声与林涛。

天渐渐黑了，没有灯光，没有人声，室内空空荡荡。我与盛德俊的尸体抵足而眠，我静静地躺在床上，盛德俊的尸体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无处可走，也没有走动的精力，只有蜷缩在被窝里头。

此刻，我的思想感情都很平静。没有恐惧，没有悲哀，没有怜悯与同情。因为见惯了一个，二个，三个……一同劳动的同住一室的，十多个右派分子的陆续死亡，对死人已见惯不惊。我也没有去思念妻子与女儿，因为岩水的现实太残酷，每天，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劳累与死亡的威胁之中，哪里还有思念妻子女儿的心思与时间？整个大脑存在的意念是：怎

样找吃的，怎么样保住性命。客观环境的力量太强大，它可以把人变得麻木不仁，变成野兽，或者变成木头。

此刻，如果还有一些思维或者感情的活动，我只有种兔死狐悲的悲凉。想到的是盛德俊已经死了，下一个可能是我，一定是我。死了也好，再没有饥饿，苦痛，也是一种解脱。

可能精力衰竭，可能思想感情都已麻木。我终于睡着。第二天亮了，我看到的仍然是盛德俊伸出被子外面那一双惨白而枯瘦如柴的两个脚板。

就这样过了一天，两天三天……直到第五天中午盛德俊的妻子胡四姐终于来了。她是盛德俊死后第三天得到通知的。没有车，步行将近两天才赶到这里的。

她揭开被盖仔细看了盛德俊的尸体，慢慢盖上。她没有嚎哭，坐在盛德俊的床边，低声哭泣，哭了很久。她向我仔细询问盛德俊的病状，生前劳动及生活状况。我尽可能尽我所知告诉了她。尽管我说话很吃力，断断续续，但我尽其可能作了答复。

下午，胡四姐雇了两个当地农民，用被盖一卷，把盛德俊的尸体抬到诊所后面荒山上，挖个坑埋掉了。

没有交通工具，没人帮助她，她又没钱。她一个孤身妇女，有什么办法？她只能这样了。

杨纯一走，盛德俊一死。病室更加空阔，更加凄凉清冷了。

我躺在床上，一时睡着，一时清醒，一时迷糊。有次炊事员送饭来，出门时说了句：“快了！”我明白，他是说我也快完了。我自己也认为必死无疑，拖一时算一时，拖一天算一天。可能不需多久了。静静地等着，等待死神的到来。

想不到的是，生机突然到来，绝处逢生了。就在盛德俊死后没有几天。中央突然下令，停止大炼钢铁。我得到诊所转来的通知：转到离县城很近的白鹤公社（这时乡已改称公社）红旗大队，参加农业生产。

活命的机会来了，求生的欲望立马强烈起来。精神一下振作了许多，头脑清醒过来。我把一床纱布蚊帐，托炊事员拿去换了十四斤红苕，吃了几顿饱一些的饭，体力好了许多。五十公里，我与杨纯一道，支撑着走了两天多，到达了白鹤公社红旗大队。

公社知道我们这些右派，个个十分衰弱，放了我们几天假。粮食定量也增加了（在岩水病号每月供应粮食 12 斤，现在恢复到 24 斤），还有蔬菜，可以吃个半饱，加上不劳动，较之于铁厂，简直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

农业劳动不再定额，轻松得多。之后，粮食定量供应又加到三十二斤。我这个濒于死亡的右派，终于活了过来。不但我，那些在岩水铁厂劳动的右派分子，如果不改变环境，继续下去都必死无疑。现在都活过来了！绝处逢生了！

### 【附：作者简介】

萧至刚，1925 年生，重庆市开县人。

1946 年考入梁漱溟主办北碚国学专科学校，后转入北碚相辉学院文史系。

参加学校进步组织突兀学社，主编突兀报，报道学生运动，受重庆警备司令部追捕，逃回开县，参加地下党工作。

解放后任区文教助理员，51 年参军，入十一军军政大学。毕业分配三十二师任工作人员、



文书；52年因病专业；57年在开县中学反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成黑帮，先后劳动改造近九年。

改革开放后，调回中学，调开县教育局教研室任教研员，评为县先进教师，地区优秀教师，中学高级语文教师。

在全国各省级、国家级发表教学论文十余篇。编写《初中语文教师教材过关考试辅导书》、《初中作文练习册》在四川全省发行。出版长篇小说《似水红尘》。

## 忆 旧

### ——《寻找好人蒋忠泉》读后感

刘一痕

#### 【文前小语——也忆蒋忠泉】

编辑同志：

奉上一篇尘封了五十多年的回忆，当局曾经再三告诫我们，这些经历不准外传、不得泄露，但这些事情的的确确是那个年代发生过的真实历史，是我的亲身经历。时过境迁，想“若要人不知，只消我不说”是不行的。我在那批“机密犯”中年纪算是最小的，想来当事的健在者也不会有几个了，所以我义不容辞必须留下这一段史实。文章署名刘一痕，其实就是“留一痕”，引自“人生飘飘何所似？应如鸿雁踏雪泥。雪上偶然留爪痕，雁飞哪复计东西。”我已来日无多，就留下这一痕罢。

敬颂编安

杨平 2014.7.27

翻开《巴山夜雨》26期，齐家贞女士写的《寻找好人蒋忠泉》赫然在目。我心中暗想，这个蒋忠泉是我的同牢班友呢？还是同名同姓的人呢？一口气读完全文，才知道写的还是五十年前我在四川省三监狱的同牢班友。

蒋忠泉应该和我同岁，今年也是八十岁了。一九五八年九月，我在成都某国防工厂被划为“极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经历了大炼钢铁，上山下厂（劳改工厂），一九六二年突然被单独押送到四川大竹四川省三监狱。被集中的这批人中有十个劳教分子，十几个劳改犯人，全是从西南地区集中来的。据监狱的管教股长和我们集体谈话时讲，你们属于“机密犯”，曾经掌握过党、政府、尖端技术这三个方面的机密，虽然你们犯了错误，但党还是要照顾你们，把你们集中起来，统一管理。之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一批专门“选拔”出来的人员中，有周总理的机要秘书（江涛）、谢富治的机要秘书（孔繁庸）、刘明辉的机要秘书（代明理）、重庆市公安局的侦察科长、侦察员。其中就有蒋忠泉，我曾是政务院（今国务院）培养出来的机要员，在过国防工厂任机要秘书，虽然改行作俄语翻译，仍属“机密犯”。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有些机要人员叛逃国外，所以才把我们集中起来，以防意外。

我们被关押在监狱的一隅，和其他犯人分开，互相不接触。因为我学过无线电，所以有装广播、修电话之类的事，就常常找我，还算技术犯人。我和监狱的电工经常一起劳动，所以还为隔壁后来专门关押胡风山的小院装过电灯。蒋忠泉他们就不参加劳动，经常读报、学习。由于“机密犯”中不分劳教、劳改，吃住都在一起，因此我和蒋忠泉生活在一起，俩人相处很好，经常下棋，齐家贞提到的那本《唐诗三百首》就是我送给他的。

“机密犯”中有刑事犯罪和政治犯罪，周总理的机要秘书江涛就属于刑事犯。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安徽人，据他说，小时候还讨过饭。他写得一笔好字，在三监时，还奉命写过两个字有小饭桌大的大幅对联贴在监狱大门口。他因摹仿总理签字骗取现款外逃，在云南被抓获，从云南监狱里调到这里来。此人人品低下，生活作风很不检点，大家对他的印象不好。谢富治的秘书孔繁庸是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嫡亲子孙、吴祖光的妹夫，大约是受吴祖光的牵连，便和爱人吴萋，一起都被划为右派。他城府很深，表现积极，没多久就解除劳教，安排到监狱干部食堂管伙食去了（当时这是最好的工作了）。

江涛开始时和我很谈得来，因为我们都是政府机要系统出来的人，我以往就间接了解过他的情况，有共同的语言。但和他同云南来的人告诉我，此人不能深交，否则后患无穷。起初我还半信半疑，此后的一件事却让我认识了他的为人。有次他主动借给我一本书，阅读时我忽然在书里发现了一个信封，是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专用信封，信笺没有了，信封上写着“中央机要局江涛局长亲启”，我一看笔迹就知道是江涛自己写的，而且我知道他从来也没有任过机要局局长，现任的李局长、黄局长我都是知道的。为什么江要这样做呢？无非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价。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还要用欺骗的手段来抬高自己，真是既无耻又可悲。以后，我就逐渐和他疏远了。

我离开大竹后听说江涛被调回云南，安排到安宁光明磷肥厂，孔繁庸 1962 年 7 月安置到昆明大板桥园艺场和吴萋在一起。

由于狱方严格规定不准我们互相谈论案情，而且还安排眼线监视，所以大部分人的入狱原因我都不知道，互相如果不是很了解也不敢谈有关情况。有位年纪比我们大（当时约五十余岁）叫蒲良全的老同志，从不和大家交谈。我们只知道他是老地下党员，被捕前是人民政府的县长，至于为什么被捕就不知道了。有一次他向主管干部报告，请求转一封信给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位干部实事求是地告诉他，只能把信转呈上级，至于是否能交给刘主席就要由上级决定了。他当时表情非常懊丧，以后写了信没有就不知道了。根据这件事，大家怀疑他是由刘少奇领导下的地下党，案情肯定与此有关。他的罪名恐怕会是“叛徒”。如若是这样，那么“四人帮”垮台、“文革”十年浩劫结束后，肯定也就平反了。

还有一个人让我记忆很深的，就是在前苏联长大，回国没几年的王公昌（俄文名字“В о л к”，在俄语中是“狼”的意思）。他是出生在东北的孤儿，一九四五年苏联出兵东北，被一位红军少将收养，带回莫斯科。此后进了军事学院，专攻枪械制造，毕业后成了一名苏军情报人员，被派到东欧，任务是窃取有关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至于他为什么被遣送回中国，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谜。我认识他时是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他任俄语助教，我是工厂送来的调干生。那时他刚回国，连中文都讲不好。最难的是到食堂打饭，他不认识菜牌上写的菜名，

只会打“白菜”（Кануцты）。他是我们班的俄语教师，我常常和他一起去食堂，帮他翻译菜牌。我也想向他多学点俄语，所以比较接近，也发现这个人性格比较粗暴，头脑简单。我毕业回厂后，听说他犯了错误，原因是他对校领导不满，竟然不知从哪里买了一包炸药，准备爆炸教学大楼。事情败露后，他把炸药扔进校旁的河里，此后再也没找到，为此他被判了三年徒刑，新婚的爱人也离了婚。

我在大竹四川省三监狱里遇到他时，感到很意外，他见到我也很高兴。这时他已经满刑了，仍和我们在一起，仍然不会写中文，所有的报告、检查都要由我代写。当时我正着手翻译《俄国文学史》（约三十万字），他帮了我很大的忙。虽然它不懂文学，缺乏历史知识，但精通俄语。于是，语言方面我搞不懂的地方，他都能帮我搞懂。不过有些涉及古俄罗斯文学历史的地方，他就无能为力了。

管教干部私下告诉我，他的档案里记载说他被遣送回国的原因，是因为在苏联时喝醉了酒，和一伙人强奸了一位六十岁的俄国老太太。有一次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问起这件事，他竟勃然大怒说哪有这么回事，档案里怎么能这样乱写？他怎么能干这样无耻的事？紧接着，他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五四手枪的研制工作，被遣送回国的原因是他被派到东欧的“Ouep”（到底是“奥地利”还是“奥里昂”，他始终说不清楚），据说那是一个繁花似锦、美女如云的地方。他在那里热恋上了一个少女，并且泄露了自己的身份。监视他的人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上级命令他杀掉少女，立即回国。不得已，他只好用手中染剧毒药物的短刀杀掉了少女。此后，感到前途无望，要求回中国，于是就被送回来了，哪有什么“强奸老太太”的事情！

我无法证实真相是什么，但特务机构利用档案编造谎话掩盖事实真相，确是常有的事。

他还告诉过我一件令我震惊的事，他说那时他非常想回中国，尤其是全国解放后中苏关系亲密，曾多次要求回国。他的养父母都是当时苏联的高层人士，告诉他说，中国现在奉行的都是苏共的政策，中共“一边倒”，要不了多久中国就

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和苏联就成一个国家，也不存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了。这话使我震惊，原来苏联早有并吞中国的野心，起码是在社会上有这种流传。据说高岗在东北时就曾提过中国加入苏联的建议。无怪乎早期瑞金建立的根据地就叫“苏维埃共和国”，军队一直称为“红军”了。

王公昌没多久就被调走，从此再未和我联系，他在我俄语书上的题词，和送我的苏联劳卫制体育运动的纪念章，至今还在我这里。

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我们在监狱里还可以下下棋，也可以读读唐诗，练练书法。所以蒋忠泉经常和我也下象棋，有一次下棋时，干部把他叫去，回来时脸上表情十分凄凉，他把手上拿着的一张证书，当着我的面撕得粉碎。我惊慌地问他是什么证书？他说是结婚证书，天下没有什么海枯石烂的誓言，刚才是叫他签字离婚，他当然签了。沦落到这种地步，我又有什么话可说呢？没多久我也轮落到了他的遭遇，爱人也提出了离婚，她原来是我的学生，那时才二十来岁，我能耽误人家吗？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请她把判归我抚养的儿子送回昆明，交给我母亲。

蒋忠泉还告诉我，他姐姐的遭遇也很悲惨，她解放前一直是地下党员，组织安排她策反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为了革命的需要，她嫁给了那个军官，并成功地策反那个军官率部起义。解放后清算旧账，那个军官被镇压，她也成了寡妇。但她一直忠心耿耿从事公安工作，蒋之所以成为侦察员也是受姐姐的影响。

不久我弟弟从昆明来信说孩子已经送到，又问我何时才能回来，我只有抄一首唐诗给他：“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

**我想这也就是我为《巴山夜雨》的诠释了。**

五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当年的难友没有联系，蒋忠泉的下落更是渺茫，从齐文中我才知道了一些情况。反思那一段时期我们这些人的境遇，才知道我们之所以会沦到那样的命运，从高唱革命歌曲参加革命到被划“右派”沦为“反革命”，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我们这批人真的“犯了错误”。这时历史的必然。在极权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只可能是这样的下场。试想如果政权已经变成了一具绞肉机，如林彪所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人权”，那么不仅一般的人会陷进去，就是自己人、内部的人、核心的人……即使曾经是绞肉机上的螺丝钉（如我等）、大齿轮（如刘少奇等），都会成为磨肉，这是极权主义制度所决定了的。因为极权主义的特点是专制、独裁、强暴、野蛮。极权主义所维护的是独裁者和他那一小撮权贵阶级的利益，这必然引起广大人民——包括他们自己属下的人们反对。用来镇压这些人的就是军队、警察、监狱、武装监狱（包括五七干校）。

一、我们这些活靶子（他们称为“反面教材”）对现任的干部，是一个巨大的震慑。使他们小心翼翼、兢兢业业、不敢“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能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同时也使他们感到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人人都害怕落入绞肉机中变成磨肉。位高权重如林彪者，也不得不驾机外逃。于是就出现了王立军这样的“聪明人”。于是现今所有的官员、干部心中都知道，如果要想保住安全，自保自救，只有采取三条对策：

二、在位时抓紧一切机会捞钱，一定要掌握一定量的财富，越多越好。

三、一定要获取一些过硬的机密材料，以便日后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一定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可以随时逃逸到“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哪怕像王立军一样逃进大使馆，才能保住性命。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贪官、裸官的原因。如果不彻底改变制度，怎么反贪、反腐都没有用。因为这些都是极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不管你怎样严格规定“七不讲”、“八不讲”，它依然客观存在。

可悲啊！可叹啊！中国人的劫难怎么永远也不完呢？

昆德拉说：“人类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所以我写下了这篇《忆旧》。

2014. 7. 27



# 纪念赵文滔兄

朱正

我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出版之后不久，一天，丁东先生告诉我，有几位朋友，都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难友，看了我那本书，想和我见个面，谈谈意见。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丁东先生就领我到了西直门内大街的一栋住宅楼，那就是赵文滔兄的家。虽然所有的人都是初次见面，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近似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了同样的见解和语言。那天谈得很是高兴。从此我就和赵文滔兄交上了朋友。他和北京的难友交往甚多，以后他就常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这样我又经过他结识了好些右派难友：吴永良、李凌、殷毅、李承欧、万耀球、张强华、沈志庸、杨崇道、张祖武、徐梅芬……

我有时候也在北京小住，住处在首都体育馆南路，距文滔兄当时的住宅不远，常有机会去看他。交往多了，相知也就深了。听他谈经历，以为很有典型性，怂恿他写回忆录，写自传。很可能他本来就有这个意思，接受了我的提议，2007年他写出了回忆录《伤害》。我在给这书写的序言里说：“文滔兄是一位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发愤写了这本书，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写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经历，但是从一滴水可以看见一个世界，其中包含了许多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按其这一性质来说，也可以称为‘资治通鉴’的。我希望有更多的难友也像文滔兄一样，写出各人的回忆和思考，作为我们对社会、对国家最后的回报。”我以为这些话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书印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收到他寄来的新书。在封底上我惊奇地发现印了五个外国人的语录。现在我把它照录在下面：

**泰戈尔：**人类的历史在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蒙田：**最极端的不公正在于，不正义的东西竟被称为是正义的。

**培根：**真理是时间的产物，而不是权威的产物。

**哈维尔：**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将导致其土崩瓦解。

**叔本华：**人们给同类施加痛苦并无其他原因，仅仅是出于恶意，在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这样作。

这五个人里面，只有哈维尔是我们同时代人。他的身份是：剧作家、政治犯，后来在“苏东波”中成了捷克共和国的总统。其他四位都是外国的古人。他们决不可能想到，在自己身后许多年，在异国的土地上，会发生什么反右派斗争、劳动教养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是你看，这五条语录拿来评论反右派斗争，评论劳动教养，是何等切贴啊。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文滔兄的阅读面有多广。

文滔兄写作甚勤，在《伤害》一书出版之后，还先后出版了《木人的话》（2010年）、《八六杂谈》（2013年）两本“网上文章”的集子，这些文章很多讨论到了反右派斗争和劳动教养的问题，其中就有很有分量的文章。按说，劳动教养，就是绕过法律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手段，完全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可是前些年还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劳动教养的考察与反思》这样的论文为恶法辩解。文滔在《话说“劳教”》等文中作了

反驳，使人感到宽慰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通过），其中第九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34）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中，明确宣布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文滔兄亲眼看到了这一恶法的废止，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我想，他的那许多批判劳动教养制度的文章，对于促成这一废止也是有所贡献的吧。至于那一位为恶法辩护的教授，现在会不会有与时俱进的考察与反思呢？文滔兄留下来的三本书，印数不多，后世史家必将视为珍本，其中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史料。

2010年末，文滔兄送了一本《文滔治印》给我。以前我只知道他书法甚美，看了这一本印谱，才知道他还长于篆刻。从这些闲章的文字里，可以看到他的经历，他的心情。像“今生曾作学、干、右、贱民、工、农、商、百姓”，概述了一生的简历。

“老子曾是第五类贱民”，右派分子在“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中排列第五，所以这样说。自称“老子”，他说这是“来点儿阿Q精神”。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这颗闲章，刻上的是他“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他在《伤害》书中说：“就在春节前三天，1958年3月17日，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大气笼罩着天空的阴霾天气。没想到这个使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竟成了我今生炼狱之旅的开始。”

“风雨沧州”、“不忘清河”、“切莫忘清河生死场”，说的都是一个地方。他自己解释：“古代沧州就是流放之地，至今还是。只不过叫作清河。去过的人忘不了有个‘于家岭’。”他就是在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劳动教养的，当年在于家岭分场饿死了许多人。

“木人岁月难忘”、“公输门下十三年”、“鲁班门下”、“公输门下”，他劳动教养回来做了十三年木匠。

“七千六百一十二天”，也就是二十年零若干月日，我想是他细细算出的沦为贱民的日子总数。“九死一生”、“傲骨经磨”、“劫后余生”，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内容。“二十余年如一梦”，宋人陈与义《临江仙》的名句，正好借用。“青春已付强权税”，他自己解释：“把整个青春上了税也不行，老右是终身制。”

“任尔东西南北风”、“人间犹有未烧书”、“时穷节乃见”这些闲章，显出了一个右派分子的坚持和骨气。这就是我的朋友赵文滔。文滔兄去世两个月了。我时时想起他。今天就用这一篇短文为他送别。

2014年7月25日

## 啊，夹边沟

——有感于夹边沟正义和善良的墓碑被砸①

高野（陕西） 大禹（云南）

【题记】

当有人说起这荒冢里冤魂

他竟以调侃的口吻开了个玩笑  
他说：秦始皇算什么  
只不过坑害了四百多个儒生  
上帝啊，这个玩笑真够残酷  
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  
竟使一个民族丢掉了脑袋  
不过，也许正是他的心愿  
也许，他不需要聪明的脑袋  
只需要给他拿锄头的一双手  
(摘自孙静轩著《告别二十世纪》)

啊，夹边沟，我心中的坟  
你是国耻，你是民愤  
五十七年前的今日，三千知识精英一步一滴血，  
一步一滴泪地走进你沙漠荒冢②  
你是中国的古拉格之都  
你是中国的奥斯维辛  
你的腹地，你的身下  
埋葬了惊心动魄的多少冤魂  
从此你闻名遐迩，即便是“南京大屠杀”  
也比你表达的意义矮三分  
那都是外国人大肆屠杀中国人  
那都是纳粹鬼子向异邦的入侵  
而夹边沟的血腥悲剧则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而且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屠杀自己的党员和自己的人民

夹边沟啊夹边沟，你有太多的秘密和隐私  
鲜为人知，从不把真相告人  
正像戈雅那幅名画的内容  
《埋了他们，什么都不要说出去》  
可是画中描写的是十八世纪的奴隶社会  
而夹边沟却发生在解放全类的 1957  
如今，半个世纪以来，心中的警钟长鸣

刻骨铭心的是对“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遗恨  
难以容忍的是把最高指示也换成了调侃的口吻

说是秦始皇算什么，怎能比得马加秦  
秦始皇充其量才坑害了四百多个儒生  
我马加秦一个阳谋就打倒三百多万专家、学者、教授，还有诗人  
再说，你秦始皇的坑儒现场只不过限于咸阳一个郡  
我则开辟了四百多个“夹边沟”遍布到全国各个地区和省份

啊，夹边沟，你孽债累累  
你是华夏千万噩梦浓缩的一个黑影  
1957 的血腥悲剧就在这个黑点上聚焦  
你是茫茫孽海里的当之无愧的历史见证  
庞大的人祸灾难之谜，犹如天体黑洞  
它的东窗秘谋，至今难以破译  
为什么把那些爱党救党助党整风的好同志  
一个不留地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他们下了仁政  
把三千无辜发配到寸草不生的夹边沟  
非常劳役加上非常饥饿的突然袭击  
三千人性之光被扑灭，两千饿殍命断夹边沟  
啊，这群死灵魂里有多少民族的大脑民族的良知  
也许这里面就有格林卡、奥巴马、高尔基和牛顿

啊，边远荒凉的夹边沟  
它比边远的敦煌还远五百里  
敦煌有直升穹空的莫高窟  
夹边沟有直接深入地下的地窖子  
它是一个群狼乱舞的阴暗角落  
它是被上帝遗忘的戈壁荒漠中的一小块死地  
划归“内矛”的右派贱民，即便个个是民族脊梁<sup>③</sup>  
一旦被强权驱逐到这里，就沦为一钱不值  
都成为，一条绳上拴着的三千五百零八个蚂蚱  
任你挣扎也难逃死神魔掌的指间缝隙  
十之八九都是活活饿死，当局发布为“病死”  
幸亏有个作家杨显惠公开出版了《夹边沟记事》  
这才戳破了对“内矛”处置的右派不杀的羊头招牌  
令世界震惊，如此血腥惨案，竟发生在一个泱泱大国里



夹边沟啊，魂牵梦萦的夹边沟  
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千饿殍的幽灵在你的上空游移  
从此，不由得令人忆起过去那个不安分的知识分子  
用轻松调侃的方式把“幽灵”写进《共产党宣言》里  
有谁知，夹边沟的幽灵比欧洲的幽灵更可怕  
可爱的卡尔，你只管不遗余力的歌唱，对其祸害却压根不提  
夹边沟上空与宣言同样的幽灵，游荡了半个多世纪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不敲打着罹难家属及幸存者的良知  
他们联合建议，在沟口建一座坟冢和墓碑  
为了永远纪念那些在这里蒙难的五七兄弟  
从此，兰州，酒泉的幸存老人蹒跚着耄耋脚腿  
跪东奔西地走访、募款、选地、刻石，一切准备就绪  
只待甲午清明节的到来，举行揭幕祭祀  
谁能料，清明节的前夕，被歹徒铲墓砸碑丧尽仁义

啊，夹边沟，我心中的坟  
你是国耻，你是民愤  
五十七年前是那样的血腥残忍  
五十七年后的今日，仍然是这样的暴戾和残酷  
一幕幕血腥，一幕幕恐怖  
都在同一个古拉格化的夹边沟演出  
荒冢无名，墓碑无名，倒是那帮盗墓者们  
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无赖无耻的“4.5 砸碑”纪念日  
旅游者艾晓明痛斥这是冲击人伦底线的卑劣行为  
幸存者任众说此为“令国魂受辱令党魂蒙羞”的缺德事  
更难解，你们既然是战无不胜的崇毛主义者  
何苦在三更半夜偷偷摸摸地取夺盗墓贼的胜利  
啊，我们要问，苍天若有眼，大地若有泪  
何不掀起冲天大浪彻底埋葬这人吃人的筵席

2014年6月初稿，7月20日改定于西安

### 【笺注】

① 2014年4月5日清明节，跟往年一样，外地的右派幸存者和罹难者家属照例要来夹边沟扫墓。而今年却遭到酒泉，肃州地方党政军蛮横阻挠进入夹边沟现场，并在清明前夕把右派遗骸冢和墓碑统统铲平砸毁。并将夹边沟口的“劳教农场遗址”标志牌拆除，凡此种暴力破坏行为，乃是继五十七年前的“阳谋”惨案又一次重触人类道德底线的滔天罪恶。这正兑现了鲍罗金的预言：“古拉格怪兽仍

然很凶恶、很庞大，张着血盆大口在那里吠叫”。

② 这里指的是反右运动，从 1957 年 6 月 8 日起，一直进行了整整一年，夹边沟关压的“三千知识精英”遣送到这里劳教的极右分子。毛的江山就是铁打的江山，他一言九鼎，个人说了算，反右一开始，毛就作了结论：“这是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和土改合作化、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等都是平行的。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环节。网罗够地富反坏右这五种敌人，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前几个“运动”虽然也节节胜利，但毛特别认为“反右”打得顺手，使不断的扩大战果，由最初的四千名，扩大到两万人，又扩大到五十几万人，58 年乘胜又来了个“补划”。扩大到三百多万各类“右派”。这便是邓小平说的反右扩大化。其根据于此。

③ 这里说的“内矛”，指“人民内部矛盾”的简称。这是为反右特发明的新名词，毛是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一个诱饵。有人说这是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毛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对立的，因此成为敌人（右派），但毛又宽大为怀，把“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至于说，夹边沟饿死几千人，林昭是自己买的子弹“被自杀”，都属于鲁迅所谓的“暗暗的死去”。这些死去的人和我们活着幸存者真可算是沐“内矛”的深恩厚泽了。

## 夹边沟古拉格遗骸冢墓志铭

高 野

啊，上千具尸体遗骸就在这里埋葬着  
他们都曾经痛苦过、悲伤过、挣扎过  
他们被批斗过、被捆绑过、被饥饿过  
如今五十七年了，将他们的骸骨一节一块地收拢  
堆积成一座没有棺材，只有尸骨的千人荒冢  
砂土隆起如奶头，他们都是母乳养大又被“党母亲”饿死的人  
他们，墓中的冤魂向年年岁岁的过往行人诉说  
他们要请莅临坟前墓后时留步，以便告诉游客  
眼前的这个白骨堆，就是当年的“阳谋”留下的罪恶

勒石地点/夹边沟古拉格遗址

铭记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志文撰写/陕甘游子 高野

### 【说明】

①上述“夹边沟古拉格遗骸冢”2013 年 6 月 8 日刚刚见雏形，就遭到 2014 年清明节肃州党政军联合掘墓砸碑的“遮蔽”。这是一对矛盾：建冢立碑者本想“突破缄默”；平冢砸碑者是对“缄默的突破”，这场“战争”看来是肃军大胜，清明节祭灵的死难家属和改正右派的幸存者被拦阻在去夹边沟的公路上。这正兑现了一位作家的箴言：“古拉格怪兽仍然很凶恶、很庞大，张着血盆大口在那里

吠叫。”（B·π·鲍罗金）。

②一个忏悔和赎罪的时代已经到来，与面目狰狞的“夹边沟”地名有关联的“右派”与“劳教”两个词都已是昔是今非，右派被改正，劳教被废除。这是国家的政策文明至此，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人民了解这两个真相的可能。今年清明节前夕发生在夹边沟里令人不可思议的砸碑平坟血腥惨案，无疑是歹徒们自己给自己埋下的政治地雷，早晚会爆炸的，这里奉告地方党政军警同志们：人血不是水。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③在俄罗斯，普京总统把揭露古拉格的书定为全民必读，普京说：“不研究其所记录的现实，就无法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不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思考未来必将困难重重！”

## 前四川省主席王缙绪将军生平

### ——为声讨“阳谋”而赍志以歿

王复加

抗战时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缙绪（1885-1960）字：治易，号屋园居士。1885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于四川西充。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1904年入顺庆中学，与刘湘、杨森等同窗；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从事军政40年，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抗战初期担任四川省主席；在抗战中恳请重返前线指挥战斗，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继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诸多军政要职。国共内战时期，他拒蒋去台，于1949年12月25日，他率军起义，让四川和平解放。他在一生之中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1960年11月，对“反右运动”持不同观点，因声讨“阳谋”而赍志以歿，终年75岁。



（图片：王缙绪）

1908年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任新军第十七镇三十三混成协见习排长，后升任连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保路同志军”，任四川陆军第二师二团一营营长；1918年任第一师军官传习所所长；1919年任二师第六团团团长。

1920年川滇大战爆发，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所部王缙绪团划归杨森。杨任川军第九师师长，王缙绪为该师十八旅旅长兼任川南道尹。这是王缙绪从政开始，他“兴农田、水利、筑路、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聘请卢作孚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长；创办通俗教育会，推行新文化运动；对川南师范学校进行改革；聘请恽代英到校任教，并亲自

印发了恽代英编著《政治学概论》等书籍。为此，王缙绪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遭到地方封建势力强烈反对，后由省议会发出“快邮代电”对此抨击。使革新运动受阻，卢作孚、恽代英亦相继辞离。

1924年2月9日，杨森部攻入成都。任王缙绪兼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缙绪就任后着手扩宽春熙路、修建少城公园；将城墙及城内大街辟为汽车站，建造公共厕所；实施市内义务教育，创办徒弟补习学校，令各商店学徒入学；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万人公共体育场，并举办了全省学校第一次运动会。王缙绪因业绩昭著，激发民众曾在少城公园以树碑刻记下了他的功德。

1925年，北伐呼声初起之际。杨森主张联合滇军袁祖铭攻打刘湘，以期武力统一四川，令王缙绪任北路总指挥，由遂宁向合川、重庆出击。川东各师将领在重庆组成反杨联军，决定以邓锡侯率部将王缙绪阻于合川；以田颂尧部侧击遂宁牵制王缙绪部。

此前，省议会向全川将领发出“息兵御侮”通电，请求川军将领“勿以目前之地位为可久，勿以操戈同室为得计，及早回头，共图善后，移内争之兵力，作外交之后盾，于国于家，庶几有济”。此后，王缙绪深明大义，知杨森之举必阻碍北伐之促成，他于7月下旬在遂宁发出通电致双方各军，主张停战协商川局。迫使杨森全线发生动摇，各部向乐山、宜宾总撤退，试图入滇。唯官兵闻云南贫瘠，不愿前往而求庇于刘湘。杨森无奈只身乘船出川，赴汉口投靠鄂军夏斗寅。四川因此太平，达到初步统一。

9月23日，北京临时政府任王缙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3年时间），师部设资中。王缙绪在驻守资中期间，继续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交通建设。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在重龙山下东岳庙内设立县立小学，聘受大批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设立民生工厂，以半工半读促使贫穷子弟入学就读；次年，王缙绪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省立第六中学”。他个人出资在上海购置仪器和书籍，还聘请了周能泮担任校长以及大批（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及美国、日本、英国留学回国的学生）担任教师。该校培育出众多人材，如：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均毕业于此校。王缙绪在驻守期内还将县政府闲余的西仓房改造成了“通俗图书馆”，并藏书达一万多册；还将当地重建了“重龙公园”，新建了听泉楼和江天阁，在永庆寺陈列图书和文物，供市民观赏；另外，在资中建3个公共体育场。

1926年，为资中川主宫成立了“资（中）内（江）”马路局，聘请留学法国土木工程师何庆延任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建成全长60公里、宽5米的资中至内江公路，是他创下成渝公路首通车路段。王缙绪还用“驻军护商款”修善西门外大堤，并在马路局设立“蒙溪河浚导处”，解除多年洪灾。

1926年8月21日，王缙绪等十三将领发出通电赞同讨伐吴佩孚。11月27日，川军自此脱离北洋政府归属国民政府。王缙绪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后任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改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移驻重庆。

1929年1月26日，王缙绪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所属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委



员长为冯玉祥)。5月17日,王缙绪提出“辞去军职留学欧美”。截选内容,“……夫血战终身,虽军人应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牺牲者究何所为,长此屠刀在手,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即全国添一乱机,川军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缙绪不幸,误入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缚;年愈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迟,改过宜勇。”王缙绪还对记者谈道:“……教育之根本,全在幼稚时代之教育为基础,然以我国而论,迄未本此原则实施。故余决心辞去军职,专赴各国考察幼稚教育状况,如管理法、教育法、保姆养成法等等,逐一详细研究,俾他日归国,能取他人之所长,补我之所拙,以从事于我国国民基础教育之工作。”由于刘湘再三挽留,王缙绪的心愿未能实现。

此时,王缙绪以身兼军职继续创办了巴蜀幼稚园和重庆《巴蜀日报》。1929年11月21日,《巴蜀日报》首日发刊。社址曾在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入杨柳街72号),每天出版两大张,“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除新闻外,还有副刊。聘用报社总编辑黄绶(元贲),编辑有江凝九、蒋阆仙、何剑华、邓宰平,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至1934年春节停刊。

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王缙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而盐商界内确有约定俗成之潜规则“对新上任的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缙绪用这笔资金(十万银元)购得张家花园旧址,并实施了创办巴蜀学校计划。而刘湘被王缙绪投身教育所感动,曾捐助修建园舍。王缙绪为之曾在巴蜀学校内,指一园舍取名为“湘院”。

1932年8月,“二刘大战”(刘湘对刘文辉)爆发,至1933年12月结束。此战为四川军阀480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其结果是,王缙绪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将刘文辉攻退西康,偏安一隅。从此,消除内战,彻底平息军阀混战,统一了四川。王缙绪这一此举,可谓厥功至伟,有利于国计民生,为后来四川省能确定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奠定了基础。

1933年2月,王缙绪继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小学校正式开学。他经好友黄炎培介绍延聘周勛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主持校务,并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租金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学校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王缙绪另行筹款从上海购置。因此,学校的师资与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学校秉承了王缙绪意旨以“公、正、诚、朴”校训,坚持“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及“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和“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创办下了,当时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莘莘学子,造就出无数知名英才。巴蜀学校曾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教育博览会并荣获奖励,享誉全球。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息定王缙绪办学亲赐“成绩斐然”金字牌匾。

1939年7月,因重庆屡遭日机轰炸,王缙绪将巴蜀学校迁往西充。学校的教学设备及仪器装了整整十六艘大船,经嘉陵江运至南充,又从南充靠人力运往西充,耗资如此巨大,为的是家乡子弟求学困难,解决西充未有中学之困。此校为西充中学的前身。不久,重庆巴蜀学校继续开办,到1949年底,已经发展成为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完整基础教育体系的重点学校,并积极筹备建立巴蜀文商学院,终因社会变故未果。

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改称“国军第二十一军”，王缙绪任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个旅，驻防合川。同年10月至次年5月，王缙绪先后担任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和第六路总指挥。

1935年10月1日，行政院召开第232次会，任王缙绪为四十四军军长，辖三师、十六团，又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10月8日，接守松潘至威州防线，在水口场、夹门关、名山、清江堰一线。11月6日，王缙绪赴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1936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授予王缙绪为陆军中将衔。

1937年6月28日，王缙绪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9月1日，王缙绪率领第44军（时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最先开赴抗日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1938年1月，因前线需要，44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缙绪担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国府令张群任四川省主席。1月23日王缙绪率35名留川将领致电蒋委员长，拥护中央决定；同日，留川部队以161师师长许绍宗领衔，六个师长同五个独立旅旅长联名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并且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情势趋于紧张。1月25日，蒋急电召王缙绪飞汉商议政务；3月6日，王缙绪、钟体乾、邓汉祥、潘文华、王陵基联名电呈蒋委员长、林森主席，表示拥护抗战，拥护中央。3月22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抗战前线总指挥王缙绪，以及王陵基赴汉；4月1日，王缙绪在汉口致电所属晓谕民族大义：“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如有不明大义，偷生畏劳之官佐，务望诸兄切实开导，俾知公忠体国，为民前锋，注意大者远者，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4月11日，蒋召集何应钦、贺国光、王缙绪、邓锡侯、唐式遵、王陵基到京和谈；4月26日，行政院会议决议王缙绪代理四川省主席。4月27日，王缙绪在前线致电蒋委员长，恳请收回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委员长致电王缙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5月8日，王缙绪通电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任四川省保安司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此后，王缙绪推出一系列新政：一、裁撤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

王缙绪推出禁烟土宗旨是：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缙绪，写道：“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行营及省府，请求改善办法。23日，王缙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飭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10月，王缙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

1938年底，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四川民众出兵出钱的担负亦日益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缙绪体念民众疾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随后，“新都实验县乡民，因不满县政府征兵及各种设施，受地方哥老及土劣之鼓动，集合团丁多人，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纷往参加。经王缙绪核实处理，省府取消其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11月22日，王缙绪以国难当头，带动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酬应；不准借婚丧庆寿大张宴席，收受礼物；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

12月7日，“中江事件继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追查事件起因，为县政人员征兵征谷舞弊，引起人民公愤。经省府派人宣慰处理，亦获解决”。

1939年1月，王缙绪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严予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3月，王缙绪亲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并拜访入营壮丁的家属，资助慰劳金等。

9月1日，王缙绪继推新役政，亲自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要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要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要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要依期迎送出征壮丁；五要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要严厉查办舞弊人员”。

王缙绪自担任省主席起，他便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在全川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王



缙绪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当年有媒体报道说：“王缙绪担任省主席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移交时，尚存现款1,000万余元。这组数字，促能体现出他主川之政绩。”

这时，川政完全在新政推行之下进入轨道。作为担负着抗战后方之职，为保证前线兵力、财力、物力，他的系列新政自然会触及权势群体。同时在查办积案、撤换大批贪污官吏，大大触犯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因此引发“反王主川”之事。此时，王缙绪确表现为身在巴蜀，胸怀祖国，以国难为重，为使他的新政继续维护抗战后方安定与配合支持前线的正常运行，王缙绪主动向蒋辞职，要求重返抗战前线。

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缙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缙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10月1日，王缙绪通令全川各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用备整编补充；二、积极组训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政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防，藉固前线。

10月底，王缙绪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重返前线作总指挥。他在前沿阵地向官兵训话：“各位官长、各位兄弟，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是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苟且偷生、争夺抢劫、分歧错杂、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可成功。”

1939年冬，全国发动冬季攻势，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拒止北进之敌。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敌人据点，占领王家店。

1940年1月，日军13师团增兵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旋经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该集团军乘势推进连续猛攻，因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任该地区攻防作战。5月，国民政府加授王缙绪陆军上将衔。

5月初，日军分兵两路，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致使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随即受敌猛攻。王缙绪率部固守大洪山西北要隘。5月16日，第五战区所属张自忠部队失利，他在战场上殉国。面临危机时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嘱第二十九军总司令王缙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追日军。6月初，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即组成



几个梯团南下。王缙绪下令固守大洪山要隘。敌部四面围攻大洪山，激战十余日后各要隘虽被敌所占，却予敌以重大杀伤，且击伤敌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此后，王缙绪又命所部利用山地隐蔽，与敌旋磨打圈，激战十余日，敌伤亡甚重。第二十九集团军为阻止了日寇西进，粉碎了敌人一举歼灭该部的阴谋。坚守大洪山一年零四个月（1940年9月至1941年底），王缙绪曾数次率部对日军13师团进行了反扫荡战斗。到1941年12月奉命开赴河南内乡整训，移交防务给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时，仍保有大洪山第一线阵地，成功阻止日军想要突破大洪山防线向战区腹地推进的企图。这就是轰动抗日前线的“大洪山老王推磨”，成为全国人民最爱戴的抗日英雄。

1942年3月，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自河南调往第六战区；7月，王缙绪升任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桃源，守备洞庭以西、长江以南的湘鄂地区。1943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向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地进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拂晓，日军轻易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第二十九集团军67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到2月底，阵地失而复得。3月上旬，敌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缙绪亲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敌我双方形成拉锯战，共激战到3月下旬，敌退守于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四处据点。4月上旬，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陈诚责无旁贷。

同年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王缙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缙绪命长子44军军长王泽濬与日军鏖战20余日，使敌未能前进，且有所缴获。此时另一路敌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加之日机猛烈轰炸，迫使44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日军旋即逼近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源。王缙绪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王泽濬率44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日军。该军150师师长许国璋于是役身负重伤，自戕殉国。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后，六、九两战区增援部队始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与日军搏战。王泽濬率44军击败桃源之敌后，奉父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

王缙绪先后抗战八年，亲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大小战斗计2300余次。所辖44军和67军共六万六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四万五千余，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四万余人。经过多年抗战之后，第二十九集团军仅存不到二万人，壮丁力夫伤亡失散更是不计其数。1944年2月，王缙绪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67军建制，只保留了44军。由军委会批准，44军仍由王泽濬任军长，辖149、150、161、162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王缙绪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陪都卫戍总司令。

1944年5月，日寇再发动对长衡攻势。6月7日，敌军第3师团窜抵古港附近，44军军长王泽濬奉父命于9日展开攻势，击破古港东门市之敌，并缴获甚多。日军继续增兵反攻，迫使44军浏阳撤退，日军68师团同116师团与我军争夺浏阳阵地，44军固守浏阳，经喋血奋战九昼夜，终以战力不支，14日退出浏阳。日军继陷攸县，此时，王缙绪亲自指挥44军

军长王泽濬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该敌。7月，日军攻陷茶陵，8月日军又攻陷衡阳，直指桂林。战后，44军留置湘粤边区。1945年元月，由王缙绪父子率部又参加湘粤赣边区作战。1月中旬，日军一部攻击茶陵、安阳南进，王缙绪指挥44军迎击，奋战阻截，敌未得逞。8月，日寇宣布投降。因抗战有功，王缙绪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和抗日英雄荣誉称号。因此，王缙绪在抗战时期就成为了全国民众最为敬仰与歌颂的英雄人物。

1945年2月10日，王缙绪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王缙绪上任即告诫部属不得欺压百姓，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整顿监狱，释放罪轻者，在两天内释放数百名烟贩，他说：“种烟运烟的都无事，吃烟贩烟有何罪？”此举触怒上峰，认为王“太霸道”。他改善劳改人员待遇，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因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鸣心。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因群众热烈参加，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王缙绪明确指示所部“为尊重民主运动起见，不拟加以管制，仅以劝告方式维持会场秩序”。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卫戍司令部奉令改组警备司令部，王缙绪所担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改任武汉行营副主任。随之，国共内战势不可挡，蒋介石曾二次打电话给王缙绪，要委任他南京卫戍总司令一职。作为王缙绪的内心，根本不想打内战，并持抗拒内战态度，拒绝接受重要委任。

1947年5月2日，蒋介石电召王缙绪到南京面洽，临行前王缙绪曾对记者说：“……首都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自王缙绪从南京返川之后，继续从事他的教育事业，并有众多教育界及文化名人出入他的府上，商讨及探索如何引领教育的发展方向。在当时，王缙绪是教育及文化界中的凝聚之人。在此期间，王缙绪已着手创办巴蜀商学院时，却吸引了有识之士们的拥簇，将可迎来“锦上添花”。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缙绪将这些成员组建成董事会，其名誉校董：曾子唯、陈怀先、赵资生、康心如、周宜甫、李奎安、王兰楫、黄之贲、汤壶研、陈丽生、连雅各、魏诩丞、杨赞卿、何说岩、唐棣之、季叔平、杨芳龄、曾纪瑞、曾吉芝。事后，国共内战再起，导致巴蜀商学院未办成功。

1948年5月16日，王缙绪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5月19日，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同日，王缙绪出席国大返回重庆，公开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说：“……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会议任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缙绪、贺国光、杨森为副主任。

1949年3月4日，王缙绪致函毛泽东，感谢承蒙优待其子（王泽濬于淮海战役被俘），继称天道忌盈应适可而止。5月14日，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系会在成

都举行大会，17日闭幕，王缙绪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会通过西南应变三大方案：政治——用人唯贤，严惩贪污；经济——彻底限田，停止征实；军事——协助国军，组训民众。

6月1日，国民政府任王缙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6月13日，王缙绪再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因我素来称蒋总统为总裁，原注）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

1949年12月7日，王缙绪任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王缙绪以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名义接管成都。25日，由王缙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王缙绪主动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1950年后，他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民主人士、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职。1950年12月24日，王缙绪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学校无偿捐献给政府。为此，邓小平同志曾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10月10日，王缙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缙绪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

王缙绪个人最大爱好即书法、诗词和收藏。他是第一批加入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齐白石等。王缙绪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沾，自奉亦简”。

王缙绪热爱乡里。当年西充经常遭遇灾害，以致“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缙绪“每接乡讯，深恻于怀。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1927年10月22日，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1937年3月2日，王缙绪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请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缙绪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总司令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百姓流传至今。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王缙绪为此持不同看法。他身边的好友都被打成了“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



就连曾动员他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这些现实情况让他无法理解。特别是官方又提出所谓“阳谋”的说法，更为让他无比愤慨和鄙视。他认为，这样极端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阳谋”，把大批受人尊敬的有识之士和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打成“右派分子”而感到震惊；同时，他看到各级领导干部把“宁左毋右”奉为圭臬，否则便被视为“右倾”而受到批判，甚至受到处分；而不少党棍把奉行极左路线，作为升官揽权的不二法门，一朝权在手，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得心应手地结党营私……他把这些弊端看在眼里，自然心生愤恨，写出了揭露和批判文章，急欲带到境外发表。为此，王缙绪请准了赴港就医的理由，不幸真相被知情人（王缙绪的秘书）告密。在深圳预先布控，待王缙绪过境之时，将其扣押至成都。一直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与世隔绝3年。于1960年，终因绝食抵抗并死于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事发当天，仅《四川日报》刊登，题为“反革命分子王缙绪偷越国境被捕”。可见未审已定罪名。事后，当局将他欲想境外发表揭露和声讨国内“反右运动”真相的文章视为绝密，采取销声匿迹，将他定为终生羁押。就连新闻已报道随身携带的罪证（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约52万字的个人日记）也从未曝光，至今都无法让人看到。

王缙绪在看守所关押3年期间，既不提审也不定罪，视为终生羁押。与此同时，改写与他相关史料，否认他的抗战经历和率军起义事实，将其打入另册，完全做到官方史册未有其人。让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为人知。

【材料来源：事迹部分基本采用西充县人民政府志2011年版。作者：人民出版社 王复加（王缙绪长房长孙）】

## 归来者背后：政治犯出狱记

袁凌

电影《归来》以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为蓝本，讲了一个犯人从“文革”前后的劳改营历劫归来，与家人团聚，重寻亲情记忆的故事。主人公一家历尽曲折团圆，人性的温暖感动了满座观众，湿透了一地纸巾。

但从现实中来说，从政治年代归来的劳改或者劳教人员，以致留场就业的“二劳改”和“二劳教”，他们的归来故事可能并非如此温情动人，而是乏味寒伧，甚至没有归来的机会。

这样的情形不只是发生在类似陆焉识这样的普通人身上。即使是高官或者社会名流，当他们在建国后漫长年代的某次政治运动中被



（影片《归来》剧照）



翻手打入地层，十几二十几年后归来，也是如同百年身，难以回头。在时间被强行掐断、看似凝固不动的囚徒岁月中，消逝的不仅是青春，还有亲情、事业、理想，更多时候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和户口。只有少数人拥有陆焉识的幸运，只有更少数人能够从头再来，找回荒废了的青春和事业，重新获得家庭、事业和尊严。多数人实际已失去了“归来”的机会。甚至很大一个群体到了今天，仍然面临没有工龄、无法退休的遭遇。

这是一部电影无法完全揭示的。

### 出秦城记：此门走出也无家

1976年，关押9年的秦城囚徒李锐终于走出了燕山脚下的铁门，却无家可归。他的妻子范元甄早在庐山会议之后就离了婚，子女也与其决裂。四顾茫然的李锐，吟出了“此门走出也无家，一阵春风两眼花”的诗句。相比之下，铁门之内倒好像算是习惯了的旧居。按照当时中央专案组的政策，仍是戴罪之身的李锐被重新安置到他被抓之前下放的安徽磨子潭电站，生活自理。



（图片：李锐）

一位在电站工作的上海女知青爱上了他，可是不久就被调走了。两年后女儿李南央来到磨子潭，父女在电站水库边长谈庐山会议内幕，消除了长年隔阂。为表父女团聚和解之情，李锐拿出当初打算送给上海女知青的一条裤子送给李南央，作为见面礼。这份贫乏年代里卑微的礼物，李南央虽觉尴尬仍只得收下，心里决定替父亲奔走平反。好在不久之后，李锐终于回到北京。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师哲，曾任苏联肃反部门上校，“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关入秦城。1975年5月师哲出狱，面临的是比李锐更尴尬的处境。组织安排其住在招待所，师哲不明就里要求回家，前来看望的子女亦不便说明。回到西廊下2号的家中，妻子周惠年见面后就避入里屋，随后虚脱晕倒，儿女忙于照顾母亲，师哲一人在饭厅坐了一夜，天亮后又回到招待所。此后才知道妻子已在“文革”中与其离婚，她解放前曾经被捕，有自首嫌疑，“文革”中屡遭批斗，与师哲离婚实为自保和子女前程，师哲亦无可奈何。

以后师哲一直单身，由组织安排生活，女儿师秋朗常去看望他，发现他从外到内都像个男版“白毛女”，不仅幽闭于密室多年，头发皮肤全白，且语言与时代脱节，一开口就是50年代的语言，不了解“文革”和以后的社会，父女几乎无法对话。他虽然出了狱，也由组织安排当了社科院的顾问，却顾而不问，只是沉浸在昨日的世界和对毛泽东的追忆里。

杨帆与家人团聚的情形一波三折。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杨帆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由于“特情”战线的高风险，杨帆在50年代初就像《风声》中的人物一样遭到清洗。以后先后在功德林监狱、秦城监狱关押二十余年，1975年走出秦城，安置遣送到湖北沙洋农场，心智却留在秦城囚室的迫害阴影中，经常自言自语地跟想象中“控制的电子”交谈，和今天的许多上访者一样，相信有一套看不见的电子发射系

统在控制他的大脑电波，并且自认为“天天在和周总理说话，说我老婆孩子被保护在北京。”

1978年妻儿去农场探望杨帆，见面后受到杨呵斥：“你们要自重，不要冒充别人的家属。我知道你们是江青派来的……”随即破口大骂。妻子想尽办法接触也没有用，杨帆见了就跑。妻儿无奈要回京了，杨帆破例请他们吃饭，却在席间郑重地说：“今天这顿饭是组织上让我陪你们，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

以后杨帆被接到上海精神病院治疗，三个插队回来的女儿轮流在病房照料，杨帆已不认识她们，只好以护士名义出现。一天，三女儿主动告诉他，自己不是护士是他女儿，杨帆还不相信，但对她们的体贴照顾也很感动，因此勉强说：“我有女儿，你们叫我干爹吧！”亲女儿认成干女儿，骨肉不相识，这是秦城监狱单身牢房结出的“奇异果”。一年多之后，杨帆才逐渐回归正常。

秦城是专用关押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监狱。从秦城走出的囚徒遭际如此，更可见普通囚犯归来的艰难。

### 右派归来：无味的末班车

80余岁的甘粹没有子女。除了老伴，他最亲近的“亲人”是建国门附近通惠河公园的几只流浪猫。他会每天提着布袋，装着猫粮去找它们，知道它们各自的就食地点。

甘粹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被打成右派，此后发配到新疆南部喀什劳动营，一直到“拨乱反正”才得以回到北京。帮助他平反的同学陈敏记得，初次从新疆回北京的甘粹一身长年未换洗的衣服，不敢在沙发上落座，她立刻带他买了一套新衣服换上。

甘粹的未婚妻林昭也被打成右派，两人要求登记结婚却被拒绝，称“右派结什么婚”。

林昭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文革”中被处决，甘粹回到北京时孑然一身，住在单身宿舍里。几年后陈敏给她介绍一个去新疆支边的女知青，结婚那年他已经近50岁，爱人当时40来岁，离异有一个孩子。

“这个世界并不好，不打算让孩子来世上受苦”，自身的经历让甘粹放弃拥有后代，但年龄或许是另一顾虑。

已有婚姻家庭的右派，像《归来》中的陆焉识那样历劫团圆者是例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活困境下，婚姻和家庭都难免解体。

顾准原本伉俪情深，但妻子汪璧一再遭遇政治压力，在“文革”中出于孩子们的前途考虑与顾准离婚，不久自杀，子女也和顾准脱离关系，顾准几年后在妻离子散中去世，和母亲亦未能生前谋面。今天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的墓地丛林里，一块普通的黑色石碑上刻着“顾准、汪璧之墓”，由子女们共立，算是这对被时代悲剧活生生拆开的夫妻死后团聚。



（图片：青年甘粹与林昭）

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刘显声，57年被划为右派，送农药厂劳动改造。64年他和厂里的一个女工结了婚，生下了大儿子。“文革”开始，他作为“牛鬼”被撵出红海洋北京城，落户到老家辽宁海城，因为偷越结冰的松花江试图去南韩，结果被“小兄弟”北朝鲜交割回来，坐牢8年。

期间无法维持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另嫁，等到刘显声出狱接回大儿子，儿子会唱东方红，但已经不说话了，也不知道1加1等于几。刘显声没有去问这8年里发生了什么。他带着大儿子回到农药厂住了下来，闻着弥漫的农药气味直到厂子倒闭。

如今近80岁的他和不说话的儿子住在一间宿舍里，带着儿子起床吃药喝水上厕所下楼锻炼。他担心的是，一旦自己去世，这个没有单位、亲人，甚至没有正常智力的儿子，将何以在世上度日。

少数历经劫难、背负政治压力保存下来的家庭，其间都经历了生死一线的危机，在物质条件被剥夺干净的情形下打入另册，单单靠着人性的光辉支撑下来。

譬如胡风的妻子梅志，在胡风入狱后带着三个孩子在“反革命家属”的烈日下求生，之后自己也被关押，数年后才得知胡风下落。“文革”中，胡风在四川狱中精神崩溃屡次试图自杀，梅志更是自愿以无罪之身入狱坐牢，只为了挽救胡风的性命。直到“文革”结束，两人才一同从牢狱回到人间，晚年梅志写下《伴囚记》一书，为对抗强权的人性光辉留下见证。这样的坎坷历程，早已不再是她早年擅长的童话故事。

有一部分右派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搭上了快车，走到了时代的前列，譬如江平和张思之、茅于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漫长时光的耽误使他们在时代中退化，平反得来的更多是一个待遇，在迎头赶上的新一代面前力不从心，只能勉力进行人生补课。对于他们来说，历劫之余归来的人生，更像是无味的末班车。



（图片：青年胡风和梅志）

此外，更多的是那些埋骨荒野，从未有机会归来的亡魂。譬如夹边沟和峨边沙坪农场的成千上万饿殍。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中，描写了一位前往农场探视却得知丈夫死讯的“上海女人”。这位上海女人亲手挖出丈夫被割食残缺的尸骨，找来汽油烧化，将骨灰带回上海，算是终究带着丈夫“归来”。

### 思想犯：重新打开思想羽翼

1979年，刑满释放的杨曦光走出湖南建新农场，这个听起来很不错的地名当然只是劳改犯人“艰辛”的谐音。杨曦光在“文革”中由于发表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触怒中央“文革”和最高领袖，获刑10年。出狱之后，这个顶着“反革命”帽子的名字当然不好再使用。他被迫使用乳名杨小凯，就是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震铄当今的名字。

作为一个“反革命”刑满释放犯，杨小凯被释放后没有工作。他在父亲家闲居一年，此



后受雇于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科院实习研究员，因思想犯历史被拒绝。第二年他再次投考，终于在院长于光远支持下被录取，从此得到了重新踏入学术界的机



（图片：杨小凯）

会。由于他的“反革命”案一直未平反，此后杨小凯的出国申请通不过，由总理委托刘道玉办理才成行。出国后的杨小凯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数量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但不幸这一可能性未能变成现实，杨小凯在56岁的年龄去世，早年在劳改营里的艰辛积累了身体欠账。

作为思想犯，杨小凯“归来”的历程仍是幸运的。胡风和路翎走出高墙的时候，已经大部分丧失了才华和思想能力，以前的思想者光辉一去不回。他们费尽心力写出来的晚年文稿，达不到基本的发表水平。他们由思想者变成了时代的化石。

底层思想犯的归来更是历尽辗转。上海中学生刘文忠“文革”前夕因为和哥哥刘文辉投递“反革命”传单、批判“文革”和伟大领袖被捕，哥哥枪决，刘文忠在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度过十余年，“文革”结束后才平反获释。

回到社会却不甘于工人身份的刘文忠，不顾小儿麻痹的身体短板下海，贩打火机卖羊毛衫炒股票经营化妆品公司，终究赚得不菲身家，却因意外在飞机上获赠一本《古拉格群岛》，痛哭流涕而放手生意，重拾亡兄遗志，出版囚徒回忆录和刘文辉传记，并游历东欧诸国写作新海国图志，思考社会道路，为反思历史保留一手资料 and 提供个人视角。

思想犯归来，是当代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尤其是“文革”之前或者中间产生的新一代思想犯，入狱时年纪尚轻，很多人熬过了刑期，等到了重新打开思想羽翼的日子。

在当下著名的历史学者中，有好几位在政治年代有着牢狱经历，包括大名鼎鼎的杨奎松、沈志华、王学泰诸位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独特现象。杨奎松固属短期入狱，王学泰和沈志华则都数年坐牢，王学泰入狱之前已被打成“反动学生”劳改多年。沈志华以“中央情报局间谍”罪名的入狱甚至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严打”风潮中。

王学泰出狱后任中学教师，以后致力于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背后的“流民文化”本质，为当代史增添了新视角。2013年他的《监狱琐记》出版。他的个人生活则极为俭朴，穿着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狭窄的家属楼里。

沈志华出狱后下海经商，多年打拼之后回归学术界，以血汗巨资复制苏联解密档案，为当代史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资料库，成为思想者“归来”的奇迹。

### 平民：无法归来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严祖佑的儿子是律师，近年代理了几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当年的劳改劳教犯们期满后留场就业，在“文革”结束后选择回到上海，却没有工人身份，自己营生糊口，到退休年龄却没有工龄，无法退休拿社保，年过七十仍旧卖茶叶蛋开杂货店度日。



这些人都是严祖佑介绍给儿子的当年狱友，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关心这些事。和因为思想犯罪几度入狱的严祖佑不同，这些狱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运动的年代里由于所谓“耍流氓”或者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入罪或劳动教养，从上海发配到市劳改局所属的安徽白茅岭和军天湖劳改农场，期满后又“留场就业”，成为“二劳改”、“二劳教”，却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农业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还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劳动力”。

“文革”结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释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时，农场出台政策，规定留下来者可得到农业工人户口，选择回城者只能自谋出路。很多人选择回城，严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没有难倒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却把他的那些普通狱友们打入了今后数十年社会最底层，沦为黄鱼车夫、燕子店小贩和临时工。到了老年，他们由于当初的“原罪”，成为社保系统之外的“局外人”，蓦然发现当初自己虽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国家却没有承认他们的“归来”。

相比之下，那些当年选择留在劳改农场的人似乎显得“明智”了。严祖佑回军天湖探望期间，看到当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边却形成了庞大的“犯人村”，全是当年未返城的劳改劳教犯，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由于打工潮兴起，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愿意屈居僻乡，犯人小区里居住的多数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业的狱友们，这些人对自己以终身代价获得了一个“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犹感庆幸。

严祖佑觉得这个“无法退休”的群体相当庞大，仅他接触的狱友就有几十位。比之于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构成了一部没有声音的《人曲》。

“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虽然声势浩大，主要对象仍旧是遭迫害的老干部和右派知识分子，并未完全覆盖底层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纲上线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纪录片《罪行摘要》显示，“文革”中浙江农村中十几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农民，几乎没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后，他们各自顶着帽子，在冷眼和恐惧下度过余生，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离婚，很多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时隔50年，他们说出的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际上，他们从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纪录片《罪行摘要》剧照）

几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区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迁的废墟中，我见到过一位腰身弓得像虾米的老人，像在一部电影的慢动作镜头中移过街头，提着一个装有两个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饭。

这位老人当年是纱厂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营引发的上海工潮中领头，向公方干部索要被克扣的奖金，事后入狱，在囚牢和农场度过数十年。

直到“文革”结束后归家，他已经蜕去了当初的任何青春痕迹，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恐惧，却又时常忍不住偷偷切齿咒骂。他一直单身，和同样被劳教过一直单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迁公司大锤敲破了楼顶、堆满了垃圾杂物的老屋里，每天到区图书馆看报纸打发时间，风湿病使得他的腰再也无法直起，只能像虾米一样前进。这个当年拥有青春、勇气和技术的年轻工人，已经彻底在监狱和劳改农场被剥夺了任何的人生价值，剩下这个一无用处的躯壳，在大街上缓缓移过。

他没有归来，归来的只是这个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过他的身体看到了废墟围墙上的大幅标语：坚决支持拆迁，配合世博会圆满召开！

〔转自《真话频道》〕

## 消逝的五座劳教营

袁凌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八十三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最后关闭。在和存世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

这也是诸多“坏分子”和所谓“社会渣滓”的命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丛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

这些劳教营曾经显赫一时，血统延绵至今，却大多隐藏在档案和卷宗的尘霾中。近年来，随着当事人回忆和有心人的发掘，中国“格拉古群岛”（注：右派语，倒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尤以夹边沟农场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无从清晰勾勒。这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蒙上了面纱。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苏北利亚”、清河。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部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

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但他毕竟记下了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 兴凯湖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数名犯人被判处死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锐、丁玲和作家从维熙也曾经在兴凯湖下放劳动过。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孝在其中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但科学仍旧难免误差，北京大学物理系右派刘奇弟，因替胡风鸣冤被判刑关押到兴凯湖，1961年在小号中冻馁而死。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场堪与匹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的领地可以延伸至遥远的中苏边境，也可见专政力量之无远弗届。整个



密山县，密麻麻布满了劳改和劳教农场，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当年的“留场就业”人员后代。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1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电线，圈出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劳教犯人中长年展开斗争批判。张元勋的难友文怀沙，经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谭天荣在清河也挨过耳光。文革中遇罗勉前往探望被劳教的姐姐遇罗锦，亲眼目睹一犯人劝说同伴勿唱样板戏词“不怕牢底来坐穿”，恐怕被人当做是影射，全体犯人立即厉声斥为反动、“攻击样板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遇罗勉对专政下的人性恶感到震惊。告密揭发成为流行风气，稍微顶撞管教就会上手铐。毛泽东逝世时气氛更紧张，所有管教人员都荷枪实弹。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被当场抓获，母猪杀掉无人吃肉。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性压抑导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碎了煮熟，掺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可惜由于身患多种癌症，他没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识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的美好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在大会上公开为胡风辩屈的美学家吕荧，就死在被称为“等死队”的三分队北砖窑里。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栏，和夹边沟的右派一样标为肺结核、肠炎、肝炎等疾病，实际上都是饥饿。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道，释放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遇罗勉说：“劳教时还有盼望，一就业就永远失望了”。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张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分子“脱胎换骨”之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 5000 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 23 人，数月后剩下 7 人，与其他组合并为 20 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 6 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 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 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 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人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林宪君曾经在大堡分场带领 14 名“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 3 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一次一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前见妈妈一面，话头未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经耗尽了人体的所有养分。

2013 年 5 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纪录片通过走访幸存者，还原了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1957 年末，四川省仿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 9 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的前景破灭，开荒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据当事人透露，一共死去 2600 多名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求接回孩子却遭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 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的铁流身处同一囚室。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到 1970 年代由于人满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 2006 年，才搬迁至四川眉山。在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2008 年，《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记者与沙坪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该报

道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厚的绿色苔藓”，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藓更卑微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道还透露，2008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劳动教养基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家三



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 32 个，畜牧场 23 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 5 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 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 95000 人，有 25000 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 5000 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

《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 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 2500 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 5 年多，1982 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 年以后，上海还向青海调犯 2400 余人。

2013 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 200 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 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瘙痒。周培桐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著也没有机会出版。

##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应运而生和消失了难以计数的劳教（动）营。以上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数百名女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3万亩。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期，充当了右派分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

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在，基因犹存。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它们重来。

〔转自《共识网》〕

## 八十年一梦

白桦

（2011年10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文化人，和所有中国文化人一样，有着来自传统的先天缺陷。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命题，至今都没有在观念和实践上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解答，那就是爱国与忠君。

什么是爱国？爱国是对于母体发自内心的感恩和依恋。忠君是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忠君是卑微的、盲目的屈从和崇拜、可耻的助纣为虐。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的许多精英，却套在这两个相反的概念拧成的一根绳的绳索里，困感到死。屈原爱到生命难以为继的爱是楚王统治下的楚国，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父母之国。历史书里，绝大多数忠臣良将都是忠君到死。岳飞的“壮怀激烈”是为民请命，同时也是为了“靖康耻，犹未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最后是为了“朝天阙”。1982年我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过一部话剧《槐花曲》，假设岳飞在风波亭被处死之前，回顾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漫漫征途，从而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一些另类的思索。很明显，我试图通过这部话剧解开这根“三千年之绳”，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受了这部作品，进行了彩排。遗憾的是，彩排那一天，偌大的观众席上只有我一个人。大幕徐徐降落之后再也没有升起来。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出生在1930年。八岁，我亲眼看到抓鱼游泳的小河被日军当做屠场，玫瑰红的河水在我脚下流过。十岁，日本宪兵从我手里抢走我的父亲，我一辈子都懊恼自己的的膂力太小。父亲被关押、被拷打、被活埋。十一岁，我远走他乡，半工半读。我坚信是在为复仇积蓄力量。

十六岁参加学生运动，我坚信我是在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呐喊。十七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坚信我是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十八岁，我在淮海战场大雪和炮火覆盖的堑壕里，咬破右手中指，写了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坚信我是在为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而献身庄严宣誓。十九岁，1949年十月一日，我随军踏上中山先生的乡土，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孙先生！革命已经成功了！我坚信中国革命真正是彻底成功了！二十一岁，进入文坛，我坚信我的作品是崭新的、革命的文学。二十五岁，仅仅因为送给胡风一块大理石砚台，被隔离、批判、审查八个月，我坚信是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因为胡风是反革命（虽然我一直都把他当做“歌德派”，他也确实是“歌德派”）。二十七岁，仅仅是说了一句要允许文化人具有个性和自己在文艺上的爱好，文化人的协会不应当是衙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二十多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我坚信党和毛泽东没有错误，错误在于我自己。三十六岁，以我的全部作品作为罪证，被隔离审查七年。我坚信，连郭沫若都自轻自贱，赌咒发誓自认罪名，我算什么。一直到十年浩劫，让人震动的是：不少被迫自杀的著名学者，在遗书里只有两个内容。一是高呼冤枉，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再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就是古代皇帝赐死后的“望阙谢恩”吗？当“万寿无疆”的颂词每天套红在报纸上出现并声震云霄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不就是清末唯一可以让垂死的西太后哈哈一笑的声音么？

1967年夏天，我在被隔离中，偶然在一张飘落在地上的造反小报上，瞄到一则“捷报”，写着：“特大喜讯：红卫兵们在某古宅抄家，抄出了十面黄龙旗！他们随即登上城墙，面向北京挥舞黄龙旗，向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宣誓，表达自己的无限忠诚。”顿时，我的困惑消失了！一种转换为疼痛的羞耻感袭上心头。那时，距离辛亥革命已经五十六年了；今天，时光又过了四十四四个年头，加起来整整百年。

文革后期，我才开始独自反思自己的一生。我才开始有了疑惑！回首历史，那些曾经被我们嘲笑过的历代士子，包括曾经出将入相的能臣、佞臣，他们为了依附皇权，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演绎了多少悲剧和闹剧！深知他们可笑而又可怜。此时我才醒悟到：我自己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么？但当时连这种醒悟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就是1981年春天我被举国媒体讨伐的原因。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部电影剧本里，我只不过提出了一个天真烂漫的问题：“您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振聋发聩，有人认为实在是大逆不道。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古老的困惑呢？

其实，一百年前答案已经有了，而且已经付诸实行。——那就是走向共和。

但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整体，在实践中的分辨能力却相当之低下。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随着长期帝王独裁统治的历史重复更迭，“帝王至尊”一直深入人心。拜历代封建文人之所赐，帝王和他们的统治制度，始终联系着亿万民众的渴望。臣民长期过着没有起码的尊严、自轻自贱的日子，却把皇帝强加给自己身上的诸多灾难都当作恩赐。被凌迟处死，还要谢主隆恩。甚至会为因穷奢极欲而亡国的帝王悲哀、惋惜。皇帝真的是天子吗？真的是天生的英主吗？我们的史学家很少把历史上皇帝的真相告诉后世的人们。其实，除了



少数几个开国皇帝，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低能儿或畸形儿，皇帝的所谓教养来自——也只能来自老朽的文臣，以及身心残缺的嫔妃、宫女和阉人。很多史家或由于自保，或由于逢迎，或由于为尊者讳，独裁者的面容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彩绘。特别是一些做历史小说、拍电影、电视的人，林林总总的“王朝”系列、“大帝”系列。正说者有之，戏说者亦有之，大多数都在渲染“皇权天授”的理念。在每一个皇帝身上都注入了太多的英明、仁慈、优秀、神勇、刚毅。其实，天下最自私的人就是一小撮独裁者，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死守他们的皇位。他们的伎俩就是在超级强大的武力镇压和威胁下，致普天下万马齐喑，让臣民心甘情愿地接受镇压、杀戮和奴役，还要山呼万岁。譬如在某些文化人倍加欣赏的清代雍正、乾隆两朝，皇帝对“非议时弊”者斥之为“狂吠”，并以刀封喉。所以我们的历史只能是一部大多数人在昏君治下，不断祈求上苍恩赐一个有道明君出世的历史。中国的智慧有意无意都在为帝王献策，甚至很少考虑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期待，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忘得干干净净。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确实是“一日不可无君”，就像毛驴的脊背上失去沉重的粪筐一样，时刻都不得安宁。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拱手把大权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仍嫌不够，经过三年筹划，居然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五年——1916年元旦登基称帝。虽然很快遭到共和人氏的激烈反对而颓败。但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九龙宝座，并未从此崩塌。袁世凯生前死后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仅仅一年，又有张勋复辟。张勋的辫子军只有区区五千之众，他把一个被废弃的“小皇帝”扶起来，居然闹得煞有介事，沸沸扬扬。连京城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而且供不应求，有些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来支应门面。许多人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猪尾巴”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学识渊博的康有为似乎早有预见，提前蓄了发，而且在张勋复辟之日，得意洋洋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王公贵族、遗老遗少是为了捞回失去的天堂，平民百姓为了什么呢？当然是脑子里的“神圣皇权”在作怪。幼时，每当我看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史料，总觉得实在滑稽可笑。可是弄明白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口号之后，弄明白他们以“国情”为借口，实行无限期的“军政——训政”，“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时候，我就笑不出来了。他们维持一党专政的秘诀，依然靠的是警、宪、特务。国民党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那里得到丰厚的政治遗产，冠以“中华民国”的名号。除了剪了国民后脑勺的辫子，最醒目的变化是茶馆酒肆的墙上贴了许多“莫谈国事”的标语。谁都知道，那并非政府的公告，而是国民对自己的警告，说明有些国民已经开始懂得，这就是不打出龙旗的帝制。政府时不时杀戮一批异己，有时公开处决，有时秘密暗害。国民又顺理成章地成为臣民。国民党一直把“训政”训到台湾。所幸，蒋介石传位到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没有继续“训政”并传位下去，才戛然而止。

第一篇批判文字铺天盖地出现于报端和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几乎同时，声援我的电报和函件如雪片般飞来。

于是，我坚信：中国人开始在泥淖中拔自己的麻木的腿脚了，虽然拔得很辛苦！

